



TITLE:

中國石刻文獻研究國際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書

AUTHOR(S):

CITATION:

中國石刻文獻研究國際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書. 2007

ISSUE DATE:

2007-03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65858>

RIGHT:

中國石刻文獻研究 國際ワークショップ

2006年 12月11日(月)~12日(火)

会場：京大會館 101 號室

周知の通り石刻文獻は中國の歴史と文化を研究するための極めて重要な資料です。これらの文獻の内容を言語面で十分に理解し、その撰述の動機などを解明しようとするれば、文獻學的な道具立てが必要になります。また石刻には個人や社會の功績を稱えるという側面以外に、藝術的價值を觀賞するという機能をも併せ持っていて、一種特異な素材と言えるでしょう。石刻史料については、過去數十年のあいだに新たな發見が相繼ぎました。世界各國で個別に努力が行われた結果、目録の刊行により舊來の蒐集の再検討が進み、便利な研究工具も益々完備してきました。

今回のワークショップは、石刻文獻の研究に従事する各國の學者と研究機關の連携を目指しています。相互に情報交換を行い、石刻に關する理論的及び技術的な諸問題を議論し、目的ごとに個別の協力關係を築くための提案を行います。さらに石刻研究のための永續的な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し、定期的な研究集會を開催できる可能性を探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プログラム

12月11日(月)

13:30~17:00

開會の辭

- 趙 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石刻的主要類型與形成過程」
- 氣賀澤保規(明治大學文學部)
「房山雲居寺石經と金仙公主—あわせて唐後半期の刻經事業の展開と唐代社會」
- Silvio Vita(ローマ大學)
“Chinese Epigraphy: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nd Co-operation Projects”

■問い合わせ先

京都大學 21 世紀 COE (森川) 075-753-6997

イタリア國立東方學研究所 075-751-8132

主催

- 京都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
「東アジア世界の人文情報學研究教育據點」
- イタリア國立東方學研究所 (ISEAS)
- フランス國立極東學院 (EFEO)

12月12日(火)

10:00~12:00

- 愛宕 元(京都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科)
「唐代の巨大な節度使墓誌銘二例」
- Lothar Ledderose(ハイデルベルク大學)
“Commentary on the Rock: Jingshiyu 經石峪 on Mount Tai 泰山”

13:30~17:00

- Kuo Liying(フランス國立極東學院)
“Inscriptions on ‘Stone Banners’ (*shichuang* 石幢): Text and Context”
- 井波陵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資料について」
- 安岡孝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

閉會の辭

Chinese Epigraphical Documents: Projects and Perspectives

Kyoto Workshop 2006

December 11-12

Kyôdai Kaikan, Room 101



Epigraphical documents have been one major source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textual features of these documents in terms of language and purposes of composition require specialized philological tools. Moreover, inscriptions are also material objects with a recognized function for the celebration of individual as well of social values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their aesthetic qualities. In the last decades they have received attention through new discoveries, reconsideration of old collections through publication of catalog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phisticated research tools, all resulting from initiatives carried out independentl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e 2006 Workshop will bring together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epigraphical sources. The event should offer an occasion for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discussion of theoretical as well as technical issues related to inscriptions, and presentation proposals for co-operation. Finally,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permanent network for epigraphical research which will hold meetings on a recurrent basi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PROGRAM

11 December (Monday)

13:00-17:00

Welcoming Address

Zhao Cha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Main Types of Chinese Inscriptions and their Evolution

Kegasawa Yasunori (Meiji University, Tokyo)

The Sutra Inscriptions at Fangshan and Princess Jinxian: Carving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ang Society

Silvio Vita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 "La Sapienza")

Chinese Epigraphy: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nd Co-operation Projects

12 December (Tuesday)

10:00-12:00

Otagi Hajime (Kyoto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Two Examples of Monumental Grave Inscriptions for Military Commissioners from the Tang Dynasty

Lothar Ledderose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Commentary on the Rock: Jingshiyu on Mount Tai

13:30-17:00

Guo Liying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Inscriptions on "Stone Banners": Text and Context

Inami Ryôichi (Kyoto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The Epigraphical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Yasuoka Kôichi (Kyoto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anji Characters Data Base for Digital Rubbings

Farewell Address

Co-hosted by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East Asian Center for Informatics in Humanities,
the 21st Century COE, Kyoto University

Information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075-751-8132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075-761-3946

♦The 21st Century COE, Kyoto University 075-753-6997

目 次

趙 超「中國石刻的主要類型與形成過程」	1
氣賀澤保規「房山雲居寺石經と金仙公主」	7
Silvio Vita, “Chinese Epigraphy: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nd Co-operation Projects” ...	15
愛宕 元「唐代の巨大な節度使墓誌銘二例」	23
Lothar Ledderose, “Commentary on the Rock: Jingshiyu 經石峪 on Mount Tai 泰山” ...	33
Kuo Liying, “Inscriptions on ‘Stone Banners’ (<i>shichuang</i> 石幢): Text and Context”	37
井波陵一「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資料について」	53
安岡孝一「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	71

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形成过程

赵 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古代石刻的数量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之丰富都应该名列前茅。就现有的石刻文物来看，古代石刻遗存中包含有文字、纹饰图案、造型雕刻、建筑构件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内容，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到哲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美术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现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古代石刻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对石刻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往对石刻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历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编辑目录、对有关信息的记录、石刻文字辨识与内容考证等几个方面。在宋代已经兴起的中国金石学，就是以历代石刻作为主要的收藏与研究对象。就现在可以见到的古籍来看，从宋代以来，产生了近千种有关石刻的专门著录，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资料。而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科学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给石刻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即注重石刻类型的研究，通过石刻类型的归纳来更好地解读石刻文字内容，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石刻类型的产生与变化过程来揭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传统的石刻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近代以来，在科学考古发掘与调查中获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资料，有助于我们完成上述的研究课题。有关中国石刻的新发现，我在一本小书《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古代石刻》中有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可以参考。

中国古代的石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讲，应该是从原始的实用性石刻向墓葬纪念性石刻演化，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石刻类型，如碑、摩崖、墓志、阙、柱等，从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国使用的基础。而后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为代表的宗教石刻产生，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石刻类型，如造像、浮图（塔）、经幢、刻经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间形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此后，已经定型的各种石刻类型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

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有关早期石刻类型的重要发现，对于全面了解石刻类型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几个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 3000 年，西亚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 3500 年。在两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区都有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国古代专门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 500 年至 3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这就给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即中国古代石刻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及其形成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

我们在这里试着将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介绍。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块上的，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它们或者是在一块独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将天然的石块略加表面处理

后进行雕刻。中国古代将这样的石刻叫做“碣”。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态。

在山崖上直接刻写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国古代称之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一般是在山崖中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汉代以后，有时也在山崖上进行整修，开凿出一片规整的平面来，甚至有些摩崖还开凿成一个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铭。保留至今的汉代石刻中，有很多著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陕西汉中的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鄱君开褒斜道记，建和二年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右扶风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肃成县的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郾阁颂，在新疆阿克苏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等。汉代以后，摩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著名的风景胜地、寺庙和古代文化遗迹附近，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其中有大量的题名、诗词、游记、摩崖刻经、摩崖造像等。象山东掖县的北齐云峰山题刻，湖南祁阳的唐大历六年大唐中兴颂，福建南安县九日山的祈风题记，重庆涪陵等地的长江石鱼题刻等。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资料来讲，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这样的纪念石刻在中国古代出现，最早也是西汉晚期的事。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石刻开始大量出现，并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艺也非常成熟。促成这一变化的应该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见，石刻运用得最广泛的，还是在丧葬建筑之中。所以，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变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国风行开来的一个根本因素。

就现在所见，在西汉时期，文字石刻还主要限于实用性的场合，如黄肠石、地界石、纪事刻石等。但是也是从西汉时起，石材与治石技艺在墓葬中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近年发现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江苏徐州西汉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它们规模宏大，建造时的石材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山岩中开凿陵墓与用石材建筑墓室的做法在西汉时已经十分普遍。在山东一带，西汉时期已经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画像的石椁墓，有了庶孝禹刻石这样的小型碑刻。这些表现着中原葬制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表明了人们希望彰显自身声名，祈求不朽的意识。它推动了墓葬石刻由实用向纪念性的转化，从而出现了用以标志墓葬的墓碑。此外，我们推测，石刻的大量使用与文字碑石的出现还可能与汉武帝通西域后西亚北非一带的文化因素传入中国有一定关系。

中国的碑在东汉时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一件长方形的竖石，下部另接底座。顶部的形状一般加工成圆形、三角形或者平顶。这些外形与西亚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国金石学中习惯称为：圆首、圭首和平首。以后碑首增加有盘龙纹饰，并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龙首。后来发展到将螭龙首单独刻成一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长方形的石座演变成龟形、须弥座形等精美的形状。这是中国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间多有穿孔。学者多根据《礼记》等古文献的记载认为碑的形制来源于中国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辘轳座和宗庙前树立的石碑。

在碑上面刻写铭文。是树立碑石的主要目的。一般在碑正面刻写铭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把它专门定为一种文体，叫做“碑铭”。如果内容比较多，还会在背面以及侧面刻写文字。但是这些位置刻写的文字大多是题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据碑石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碑石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墓碑、功德碑、记事碑、经典刻碑、造像碑、图碑、题名碑等。

墓碑是专门树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标明墓葬的主人，颂扬他的一生事迹。它是中国古代墓葬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墓葬茔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筑的制度。根据《水经注》里对汉代陵园的记载，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鲜于璜墓碑、幽州书佐石阙等汉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在汉代，中上等级人士的墓葬中，一般采用建筑享堂一座、墓碑一座、墓阙一对、神道柱一对（及神道碑一对）这样的建筑组合。这也形成了石阙、石祠堂与石柱等具有实用建筑意义与纪念意义的几种古代石刻类型。墓阙是汉代陵园建筑中的大门。现在在四川、山东、河南、北京等地还发现有汉代的墓阙。特别是四川的多座汉阙，保存得最为完好，如雅安的高颐阙。河南登封的少室阙等保存得也不错。现存的汉阙一般高4—6米，用石块垒砌。左右各一座，相对树立。阙分基座、阙身与阙顶几部分，阙顶虽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制建筑的斗拱屋顶形式，华丽庄重，往往在阙身上刻画图象。图象的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和各种纹饰。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阙、启母阙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画。

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神道柱等。汉代与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一根刻有瓜棱纹的圆柱和柱顶的一个长方形碑面。以后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与通称为华表的望柱合为一体。

碑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出现并定型以后，很快就被社会各界广泛地使用开来，赋予它多种用途，如记功颂德、诏书告示、文书契约、书籍范本、记事等，成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一种石刻类型，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

功德碑是专门歌颂古代帝王、官员、功臣、神灵、以及孝子节妇等人伦典范的纪念性石刻。记事碑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实用方面，记录的内容有诏书、公文、契约、协议、合同、诗词、记事文章等等。经典刻碑是专门刻写古代经书典籍的碑石。形状与通常使用的碑石一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组排列，顺序刻写一部或多部经书。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刻写石经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经文的标准本，供人们对照、临摹与传播。最早的一部石经是东汉末年制作的熹平石经，刻写了中国儒家尊崇的经典七种，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些碑石现在已经全部毁坏，仅剩下一些残石。汉代以下的各个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经的习惯。魏、五代时的蜀、唐、宋、清各代都制作了石经。其中唐代刻写的12种经籍与清代刻写的十三经至今还保存完好。图碑指在碑面上绘制各种图表的碑石。例如绘制天文图、地图、河流图、风景画、世代表以及一些著名画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图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历史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图碑是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图、天文图、绍定二年平江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阜昌七年华夷图、禹迹图等。题名碑是以记录人物姓名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树立的专门记录官员姓名的题名碑。如唐开元十一年刻立的御史台精舍碑，记录了曾任御史官员的姓名。唐郎官题名石柱也是类似的题名石刻。

中国古代石刻里另外一种重要的类型就是墓志。中国古代的墓志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传世的古代墓志材料大多是被盗掘出来的。清代末年以前，所著录的墓志数量还比较少。随着近代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有大量各朝代的墓志出土，估计可达万件以上，使得墓志成为现存中国古代石刻中数量最大、文字内容最多的一个门类。

以前对于中国古代墓志产生的时间有过多种推测，提出西汉产生墓志、东汉产生墓

志，……一直到南朝出现墓志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墓志的产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长期过程。它与碑的突然出现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应该是首先产生标志墓葬的思想与习俗，然后才在长期的演进中，将用于标志墓葬的器物经过多次变化，最后定型为长期使用的中国墓志的。

在西汉末年，首先是在画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现了刻有墓主官职姓名与葬年等字样的题记。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天凤五年（18年）十月十七日冯孺人画像石题记：“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它刻于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画像石题记，刻于墓中主室后壁立石上。这些题记作为画像石的附属题铭出现，并不是主要作为墓志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却是在墓中较早出现的成篇石刻铭文，开创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质文字铭刻的先例。

根据在山东邹城、滕州等地的汉代石棺槨出土情况，在西汉中晚期已经大量使用石棺槨了。古代文献中记录有汉代使用柩铭的事例。《汉书·薛宣传》云：“其以府决曹掾立之柩以显其魂。”《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博物志》云：“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掙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槨，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汉代已经有了在棺槨上刻写柩铭的习惯。现存实物中有在四川芦山出土的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王暉石棺，棺首刻有妇人掩门的画像，右侧刻写铭文，就反映了汉代的柩铭原状。《隶续》卷二十中还记载了汉永初七年（113年）延年益寿槨题字。这些可能也是石棺槨上的刻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柩铭与墓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器物，但是晋代的一些柩铭却改变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槨之上，而是刻成一块单独的小型碑石，虽然它的铭文中仍然是称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与棺槨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外形也向墓碑与墓志靠拢。以至在以前的金石著录中，人们也将它们作为墓志一类看待。例如晋元康六年（296年）贾充妻郭槐柩铭，外形象一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宽0.312米，与同时期的另一件晋永平元年（291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虽然自铭为墓碑，但却出土于墓中，应该也是作为墓志使用的。又如安徽寿县出土的晋元康元年（291年）六月十四日蒋之神柩，同样是刻成小碑形。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晋元康三年（293年）十月十一日裴祗柩铭也是一件单独的刻石。此外，晋元康八年（298年）魏维柩铭是一件附有两个小石柱的砖铭，高0.455，宽0.21米。它们都与后来的墓志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认为是墓志一类的器物了。

除此之外，在东汉时期埋设在墓中的石刻文字还有些自称为墓门、封记等。其内容也比较复杂。马衡在《石刻》一文中介绍了一件西汉左表墓门，并且认为“前面说的左表墓门把死者官职姓名和年月详细记载，就是墓志的用意。”这些墓门应该是指砖室墓或者画像石墓的石制墓门。在上面刻字的现象并不是很多见，可能还没有形成风气。

墓记（又称封记）则和墓砖铭一样，是与墓志相近的石刻。金石著录中记载的传世品有东汉延平元年（106年）九月十日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等。这些墓记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砖刻写而成，如1929年在洛阳北郊王窑村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刻于红砂岩上，据郭玉堂当时所见，“似黄肠石，字刻石端。”收购者“剖取其刻字一端，而弃其余。”现存石长0.46，宽0.585米，石面经琢磨，仍存凿痕。黄展岳指出：“王窑村一带系东汉帝陵区，曾多次发现黄肠石和黄肠石刻，马姜墓石为黄肠石无疑，马姜墓应是黄肠石墓。此墓石原来很可能是嵌在

墓室壁的明显部位。”墓记表现出专门用于纪念的礼仪作用。文字体例内容与后代正式定型的墓志十分相似。所以这些墓记可能就是最早的墓志。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汉代的画像石祠堂题记，如山东嘉祥宋山安国石祠题记、苍山元嘉元年（151年）石祠题记等。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应该得出一条由墓上祠堂画像石题记到墓中画像石题记或墓室题记，再到墓记的演变脉络。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祠堂画像石题记对墓志的形成也应该起过一定的作用。

综合以上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中，存在着用不同形式标志出墓主的习俗。这种标志墓葬的习俗与墓葬形制的改变，促使人们不断改进标志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富有纪念性。墓志就是在这样的改进中逐渐形成的。只是它在汉代的墓葬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种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现了名目众多，形制各异的枢铭、墓门、封记、墓记等多种石制品与砖制品。这是正式定型的墓志出现的前声。晋代开始把小碑形状的墓志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墓中的碑形墓志仍然流行。1975年，甘肃武威赵家磨村出土了一件比较罕见的前凉墓志。原石作碑形高0.37米，宽0.265米，厚0.05米。园首。碑额处题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年）十一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华墓表。梁舒的官职为“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近年来，陕西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东北原又出土了一件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弘始四年（402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吕他墓表，原石形状也是带碑座的园首小碑型，通高65厘米，原来树立在墓室中。碑额中央刻写着两个字：“墓表。”对照晋代墓葬中的情况，很明显，这种习俗应该是沿袭了晋代的丧葬制度。由此可见，晋代时，在地位较高的官员墓中树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且往往把这种小碑称作墓表。墓志这种称呼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最早出现“墓志”这一名称的是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就现有墓志材料来看，有盖的石制墓志大约出现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现知最早的有盖墓志如北魏正始二年（505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志。这种形制在墓志中占了主要地位，墓志的文体这时候也基本定型，并沿用了一千多年。

此外，中国古代石刻材料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实用性的建筑物构件或单独的建筑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础、石牌坊、石香炉、石柱、石人、石兽，象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汉代石人、十六国时期的柱础、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牌坊等。它们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上面一般很少刻写铭文。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艺术的传入，带来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艺与新的石刻适用范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石刻类型。其中直接服务于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与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经、经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铭以及寺庙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形形制，其铭文也有一定的文体格式。

中国早期佛教原来被认为是从西域信奉佛教的龟兹等古国经陆路传入。现在随着新的考古资料被发现，有了新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原，可能在汉代有过多种渠道。江苏连云港发现的汉代孔望山画像，里面有些画面被确认为佛教的涅槃图和佛像。说明佛教有可能通过海路传入。四川乐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汉代铜树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现了东汉时期佛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这些影响，又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陆路（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身毒道）传播过来的。这些汉代的石刻图象应该是中国现有的最早的佛教图象。

而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亚地区开凿石窟寺与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风气

经西域传入中原。兴起了佛教造像的热潮。从这时起，在中原各地兴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萨弟子像与其他纹饰装饰起来的石窟。著名的云岗、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宝。在不适宜开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制作单尊的石造像与造像碑。附着于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题记，如河南龙门石窟的大量造像题记就是重要的石刻资料。

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时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一种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国汉代以来形成的碑的形制来雕刻佛像以及供养人画像的。造像碑上开凿小型的佛龕，里面雕刻佛与菩萨、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开龕，有些是两面开龕或一面开龕。龕下往往雕刻香炉、护法狮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线刻大量供养人的画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长篇的造像题记或发愿文。还有一些造像碑的题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层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这种碑上一般没有文字或其他造像。

在南北朝时期，还出现过另一种具有功德性质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与甘肃西部发现的一批北凉时期制品。这些石塔大多出土于古代寺庙遗址，可能是当时僧人修禅时放在面前观像用的。这些石塔上面刻写有佛教经文，如《增一阿含经》、《佛说十二因缘经》等。北朝时期的石塔多制作成四面多层楼阁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经文。大约从初唐开始，佛教徒制造石塔的风气兴盛起来。这时制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带发愿文、题记与佛经经文等，在发愿文中自称为石浮屠（浮图）。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发现。

经幢是在唐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仿佛教的一种法物——幢。幢原来是用丝帛制作的装饰品，形似伞盖，顶端装有如意宝珠。石经幢的主体是一根刻有经咒的石柱，上有石雕伞盖与宝珠。根据现有文物，具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石经幢是陕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佛教经幢上面主要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晚唐时期起，经幢逐渐由单层变成多层，底部有须弥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规模宏伟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赵县的宋代经幢。

刻经是佛教石刻中数量最大的成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石刻佛经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润等造不增不减经。北齐时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间刻经的风气很盛。如著名的泰山经石峪刻金刚经、山西风峪华严经、河北邯郸北响堂寺涅槃经、山东邹县四山刻经等。几年前，在山东东平县大洪山上新发现的北齐刻经与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从隋代开始，由静琬法师倡导，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了佛教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刻经工程。这项工程持续近 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一共刻写有 14620 件石刻经版，还有 420 件残经版和各种碑铭 82 件。总共刻写佛经 1100 多种，3500 余卷。

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地介绍了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有关它们的形成过程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能在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房山雲居寺石經事業の展開と唐・金仙公主

氣賀澤保規

明治大学文学部

一、房山雲居寺石經の概要

世界遺産にも指定された房山石經とよばれる仏教石經は、北京市から西南 70 キロ、太行山支脈山中の房山市水頭村にある雲居寺の敷地に設けられた地下（地宮）と、寺から東北よりにある通称石經山という小高い山の山頂近くに掘られた九つの洞窟との、二箇所に分かれて保存されている。寺の歴史をいえば、まず石經山山頂近くの洞窟から始まり、刻經事業の発展する過程で山麓に雲居寺が成立したという位置関係にあり、見方を換えれば、両者は上寺と下寺とみなすこともできるだろう。

寺に保存される石經は、確認さ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は、上寺にあたる洞窟に約 5 千点（片）、下寺にあたる寺の地宮に約 1 万点あった。ちなみに今問題にする山頂洞窟における所蔵状況を、与えられた『房山石經』所載のデータから整理したのが「石經山洞窟所蔵石經集計表」となる。

石經山洞窟（全 9 洞+洞外）所蔵石經集計表

洞 号	經版石数	洞内残 石数	洞外残 石数	合計 (うち大般若經石数)	經典略数(各洞重複分含む) (大般若經を除く)		
第一洞	972	159		1131 (306+遼刻 33)	唐 10	遼 42	金 1
第二洞	1018	73		1091 (230)	唐 22	遼 79	金 1
第三洞	333			333 (147+遼刻 8)	唐 24	遼 29	金 1
第四洞	125	39		164 (95)	唐 15	遼 2	金 1
第五洞	146			146	唐 18		
第六洞	200			200	唐 2	遼 1	明 7
第七洞	283	2		285 (118)	唐 17	遼 3	金 1
第八洞	772	47		819 (200)	唐 72	遼 11	
第九洞	347	43		390	唐 191	遼 51	
洞外残石			419	419 (1+不明 1)	唐 10		清 1
合計	4196	363	419	4978 (1098+遼刻 41=1138)	唐 381	遼 218	金 5 明 7 清 1

(注) 表中の数字には、洞窟外側や周辺に所在する 21 点の唐代関係碑刻・石浮図は含まない。

表中の石經に刻された題記数：大般若經 863+ α 、一般經典約 300（推定）、巡礼題名碑 29

（紀年不明の 4 碑を含む）

さて、石経事業は7世紀初頭の隋末唐初に、静琬なる出家者の発願によって着手され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いる。それから様々な曲折を経て、事業は遼金時代までのおよそ700年もつづき、作られた石経はまず山頂洞窟に収め、それが満杯になった遼代以降、麓の寺に地下室〔地宮〕を掘って埋納されたのである。この「刻経略史」も、参考までに下に提示しておこう。

第一期：7世紀初頭の隋末唐初、静琬の発願～唐末→山上洞窟に	}	前段（洞窟蔵納）
第二期第1段：遼1027～57年、『大般若経』刻了、四大部経完成		
第二期第2段：遼1058～92年、刻経の継続→山上洞窟が満杯に		
第二期第3段：遼1094～1117年の刻経→1118年境内の地下に埋納	}	後段（地中埋納）
第三期第1段：金天会年間（1123～37年）の刻経→1140年地下に		
第三期第2段：金大定・明昌年間(1161～96)の刻経、地下室に埋納		

刻経時代による区分けと所在との関係はやや錯綜しているが、いまここで問題にしようとする唐代は、埋納の場所からいうと前段期、そして時代（王朝）からは第一期に区分され、刻経がもっとも継続的に展開された時期として理解される。そしてその継続的な事業を支えたのが、事業に協賛する上は権力上層部から一般庶民に至るまでの多種多様な人々であり、寺側はそのような多彩な人々の信仰心を巧みにとりこみ、膨大な石経として結実させた。わたしたちは石経事業に関与した人々の動向を追いかけることで、唐代雲居寺の歴史を知り、またそれを取りまく社会の様相を理解する手がかりが与え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

二、房山石経事業を支えた人々

では、唐代の石経事業はどのような人々によって支えられたのか。その主要な存在やトピックスを時系列的に列挙してみることにしよう。

1、7世紀前半の隋大業五(609)～唐貞観十三(639)：静琬による石刻事業の創始、確立期

- ・静琬こそは石経事業の基礎固めをした最重要人物となる。この地を選定し、洞窟を掘り、刻経に着手し、その後に続く大方針を確定した。
- ・刻経に主眼を置く姿勢（石経の寺）、その前提に強い末法時代の到来への危機意識があった。
- ・東魏・北齊以来の刻経中心地にたいし北に遠く離れた場所に位置する。その地理的な独自性にも注目の要。
- ・静琬期の事業は、第5洞(雷音洞)・第6洞(副室)→第7洞(涅槃洞)→第8洞(華嚴洞)の順に進められたものと推測される。
- ・静琬期の刻経（とくに雷音洞所蔵石）と先行する他の刻経との重なりを、どう理解するか。そこに静琬の独自の観点が認められないか（従来は先行する華北各地の事業との近接性、連続性が意識されてきた）。
- ・静琬じしんの師弟的、思想的系譜をどう理解するか（宝山靈泉寺の靈裕（518～605）や南岳慧思

(515～577) との関係)。その末法感もあわせて。

- ・権力当事者個人との密接な関係に埋没しない姿勢（手法）、後継者の育成や多様な支援者（檀越）の結集にかかわる手腕は評価できる。

2、隋末大業七年(611)4月～同八年（612）8月頃：隋の高官蕭瑀・煬帝皇后蕭氏および隋の官僚層による最初の本格的支援の段階

- ・煬帝が高句麗遠征のために涿郡（幽州）を本拠としたのにもない、権力の中心がこの地に移る。この機会を捉えて静琬が政界上層部にはたらきかけた結果、隋の高官蕭瑀、煬帝の皇后蕭氏、ついで隋の高官層がそれに積極的に応えることになる。
- ・このことが、事業を財政面からテイクオフさせる決定的役割を負った。
- ・蕭瑀と蕭后は弟と姉の関係、崇仏で知られた蘭陵の蕭氏の末裔で、後梁明帝の子。この蘭陵の蕭氏がここに関与した意味は大きい。

3、7世紀半ば～8世紀初め：静琬の後継者と在地有力層の協力による事業の継続

- ・静琬後継者と歴代関与石窟はつぎのように推定している。

代	僧名	活動時期	関与石窟
第2代	玄導（導公）	貞観 13(639)～咸亨 3(672)頃	8・3・4 洞
第3代	僧儀（儀公）	高宗後期～武后期(672 頃～705 頃)	7・8・9 洞
第4代	恵暹（暹公）	武后末頃～開元 14(726)頃	1・2 洞
第5代	玄法（法公）	開元 14(726)頃～天宝末(755)頃	2・4・6・8 洞

- ・静琬の個性が前面に出た時代が終わり、地味ながら刻経は2代目、3代目と確実に受け継がれた。
- ・何よりもこの時期、それまでにない在地有力層の協力を取り付けることに成功。
- ・その最初の事例は咸亨二年(671)「仏説造立形像福報經」碑（別称「張願子父母之造像碑」）。これは寺域に入る「独樹合村」の張氏一族関係者（29組）による造立。
- ・8世紀前半の玄宗・開元年間に「石浮図」という小型石塔の建立流行、これらも在地有力層の関与。とくに府兵制の軍府官が中心に関与していることが注目される。
- ・静琬後の洞窟利用の順序を集約するとほぼ次のようになる。

〔静琬期：第5洞(雷音洞)・第6洞(副室)→第7洞(涅槃洞)→第8洞(華嚴洞)]→第3洞→第4洞(法華洞)→第9洞→第1洞・第2洞

4、開元十八年（730）：金仙公主（睿宗の九女、玄宗の妹）による援助

- ・石経山頂の「開元九年（721）清信士劉元望石浮図（石塔）」の背面に刻された「金仙公主銘」（開元二十八年＝740）において、開元十八年に金仙公主が仏典「大唐新旧訳経四千余巻」と、果樹園・麦田などを寺領して下賜されたことが記録。
- ・このことで石経事業が新たな段階を迎えたと理解できる。大型經典の石経化の動きが始まる。

- ・金仙公主は道教の女道士、にもかかわらず仏教側の房山運居寺を支援する。それは何故か。また何故彼女は房山石經事業の所在を知ったのか。

5、8世紀半ばの開元後半から天宝期（安史の乱前）の新動向

- ・8世紀半ば：開元後半から天宝期の新動向として、従来見えなかった地域庶民・都市住民の参加が中心にくる。とくに新しい形としての「行（ギルド）」の登場。
- ・開元末・天宝初か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00巻の刻經が始まる。一方で他の一般經典の刻經活動が停頓する。
- ・この大事業を進める大きな組織形態は以下のものを中心となる。
 - ①個人・家族を基準にした「合家供養（合家造經）」、時に病氣治癒を祈る形も加わる。
 - ②地域的信仰組織、邑（邑主—平正—録事（平録）—邑人）。
 - ③都市住民の信仰組織、行—社（社官—社人）。
- ・最大の經典であ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00巻を石經にするには、寺側で相当大的な決断が必要であった。この時期、その決断に踏み切らせるだけのエネルギーの高まりが寺の内と外に生まれたものと認められる。
- ・都市住民をはじめて本格的に取り込む（多様な行）——幽州地域の發展の反映。同時に、刻經の目的が現世利益的性格に変わりはじめたのか。地域的信仰圏の広がりにも注目が必要となる。

6、8世紀後半～9世紀前半：安史の乱後の新展開（その1）

- ・安史の乱による停滯から復活の兆し——この時期、行（都市住民）の支援は後退し、代わって多数の庶民寄進者（巡礼集団）の結集が顕著となる。盧龍（幽州）節度使の積極的援助も注目される。
- ・代宗の大暦年間（766～779）に入ると『大般若經』刻經の復興の兆し。
- ・その後半の大暦10年（775）頃から、『大般若經』刻經に載る人名の大量化。
- ・例えば、長慶元年（821）の「仏説弥勒成仏經」1巻の建造に200名を越える名前がならぶ。以後各經ごとに数百名の名前が載るのが普通になる（原則4月8日に寄進の形）。
- ・その結果、寄進者の名前は、それまで經文の下段に刻まれたものから、石經の裏面全面を使って埋めるまでになる。他方「行」を母体とする信仰団体の動きが弱まる。
- ・こうした新展開は、信仰の広がり・刻經事業の復興ぶりを物語るとともに、個々の資金提供力の減退を語る。また人の移動の活発化が読み取れる。

7、盧龍（幽州）節度使管下の雲居寺石經事業：安史の乱後の新展開（その2）

- ・盧龍節度使劉濟（在位785～810年）による刻經状況
 - 貞元5年（789）～翌年（790）：『大般若經』巻300～315中の約半分に関係
 - 貞元5年：『妙法蓮華經』8巻、『天王太子辟羅經』1巻
 - 貞元14年（798）：『大般若經』巻390～394

元和 4 年(809)：同 卷 437～443 以上の合計：經典 2 本+『大般若經』約 20 卷

- ・この劉済の仕事に刺激されて、節度使関係者や地方官が刻經に参加する。
涿州刺史李載寧(『大般若經』4 卷)、節度押衙楊志榮(一般經典 4 本)など。
- ・このことに地方政權としての節度使(藩鎮)と雲居寺との相互補完の関係が読み取れる。
- ・節度使側の積極的関与は、かれらの信仰心の発現のみならず、かれらが抱える権力の不安定さや内部矛盾などの問題も関連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

8、会昌の廃仏前後の雲居寺と刻經の状況——円仁の五台山行との比較

- ・円仁の五台山行：開成 5 年(840)4 月 3 日青州発～5 月 1 日五台山竹林寺に。
その間に見たもの、広範な飢饉の状態、普通院、その一方での五台山信仰の広がり(送供人、供養主、旅する信仰集団)。中央では廃仏の機運の高まり(会昌 2 年=842 頃から)。
- ・しかし雲居寺の場合では、会昌年間になっても刻經活動は継続し、会昌 4 年(844)において『大般若經』卷 468 が刻出されている。
- ・雲居寺に集う人々の姿に、五台山信仰に連なる房山雲居寺「信仰」の存在は想定できないか。ただ雲居寺には文殊信仰のような強い信仰の中軸がない。——「石經」の寺、法華信仰？
- ・廃仏の影響関係としては、会昌に入って刻經活動はトーンダウンする。しかし中央の影響を蒙りつつ、なお独自の立場を維持し、伽藍まで破壊にあった様子は確認できない。この状況は会昌の廃仏時の一面を考える重要な問題を投げかける。

9、会昌の廃仏後～唐末までの雲居寺の状況と刻經活動

- ・会昌廃仏後の刻經活動は、幽州節度使張允伸にリードされる(ほぼすべての刻經に関与)。一般民の動きは刻經への動きは鈍い。

張允伸：盧龍節度使(在位 850～872)時代の刻經状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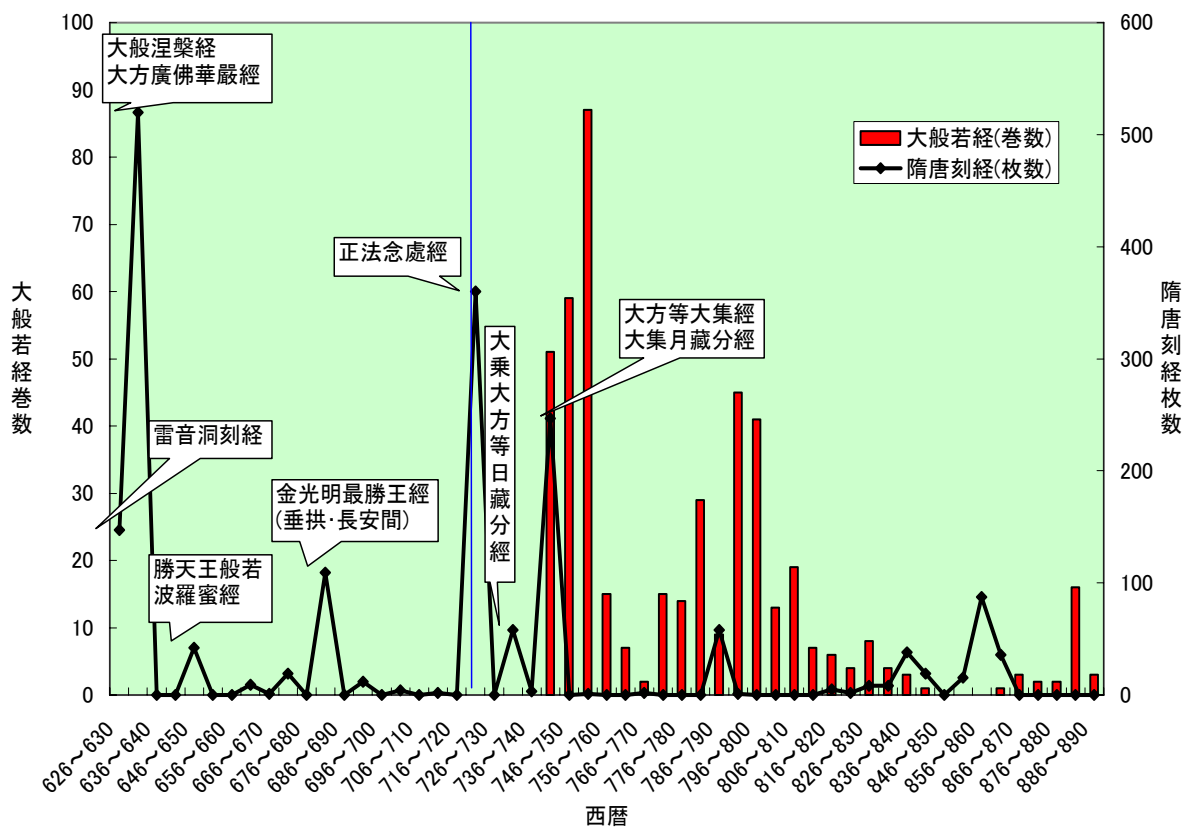
大中 6(852) 1 本／大中 7(853) 2 本／大中 8(854) 4 本／大中 9(855) 2 本／大中 10(856) 2 本／
大中 11(857) 3 本／大中 12(858) 8 本／大中 13(859) 8 本／大中 14(860) 7 本／咸通 2(861) 16
本+『大般若經』卷 472／咸通 3(862) 16 本／咸通 4(863) 10 本／
=合計：一般經典 79 本+『大般若經』1 卷

- ・このことは、会昌の廃仏以後の刻經事業を支えるエネルギーが、全体として衰退していることの反映と考えられる。
- ・ただし咸通四年(862)頃から、巡礼者の名前を刻んだ「巡礼題名碑」が単独に造られ、碑として洞窟に納められる。確認できるところで、これは乾寧五年(898)までおよぶ。この時期なお寺に集う信仰の熱気を垣間見せる。
- ・唐末の大乱とされる黄巢の乱の最中も雲居寺をめぐる人の動き(巡礼集団)がつづいていたという事実は、唐末の黄河以北、河朔三鎮の領内の様相を考える新たな手がかりとなる。
- ・それとともに雲居寺側の生き残りを賭けた巧みでしぶとい戦略が見え隠れする。

三、房山石経と金仙公主

房山刻経事業は、従来隋末唐初の前半期の状況（とくに静琬とその周辺）が注目されてきたが、上述してきたように、唐代半ば以降も刻経を積極的に支持する動きがつづいていたことが新たに分かってきた。いま全体の動向を知る参考として、唐代を通じた刻経の動向を刻出年代（年号）の確かなものを、5 年単位でまとめてグラフ（「隋唐時代刻経統計推移グラフ」）で提示してみたい（年代未確定の石経も相当あるが、当面数字には含めていない。後日改めてそれらの年代を詰めて、グラフに反映できるようにしたい）。

隋唐時代刻経統計推移グラフ



このグラフをみると一目瞭然であるが、720 年代ころから刻経の様子が変わり始め、大型の經典の石経化に手がつけられ、それにともなって石経数が大きく増えていることが確認できるだろう。なぜこの時期からそうなるか。その直接的理由として、私は前述の金仙公主（前節の 4）によって「大唐新旧訳経四千余巻」が寺に寄贈されたことが関係している、と推定している。そのほか当時の社会状況なども理由に考えられるが、当面金仙公主による援助のたまものとして、グラフには目印として線を入れておいた。

金仙公主が寺に經典を寄進したという記事は、「開元九年（721）清信士劉元望石浮図（石塔）」の背面に刻された「金仙公主銘」である。参考までにそれをあげておくと次のようになる。

○「金仙公主山頂石浮屠後記」釈文

大唐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

為奏

聖上、賜大唐新旧訳経四千余

卷、充幽府范陽県、為石経本、又

奏、范陽県東南五十里上荒村趙

襄子淀中麦田莊、并果園一所、及環

山林麓、東接房南嶺、南逼他山、西止

白帶山口、北限大山分水界、並永充

供給山門所用、又委禪師玄法、歳々

通転一切経、上延 宝曆、永福

慈王、下引懷生、同攀覺樹、粵開

元廿八年庚辰歳朱明八日、前莫州

吏部常選王守泰、記山頂石浮屠後、

送経京崇福寺沙門 智昇

檢校送経臨壇大徳沙門 秀璋

都檢校禪師沙門 玄法

(これ以下にも数行分刻されるが、金仙公主が直接関わる記録ではないためでは除外する。)

以下、この記事をつまね、次に考えられる問題を2点ほど整理しておこう。

①「大唐新旧訳経四千余卷」の意味とその後の利用状況

- ・智昇の撰した「開元大蔵経」（「開元釈教録」所載）は「総 1076 部、合 5048 卷、480 帙」であった（数字の不一致をどう理解するか）。
 - ・雲居寺における下賜（開元十八年）前の刻経数は、推定で 75 部 322 卷（約 100 年間の仕事）。
 - ・金仙公主以後唐末までの刻経数は、推定で 306 部 370 卷＋『大般若経』約 500 卷（約 150 年間の仕事）。
 - ・遼代前半期（1027～1092）の仕事（山頂蔵入刻経数）は、推定で 218 部＋『大般若経』約 100 卷。
 - ・この結果、山頂 9 洞に蔵入經典部数は 599 部（經典数未確定：約 2500 卷？）となる。このことは、相当数の經典がまだ刻出されないまま残されたことを意味しないか。それらが次代（遼後半期・金代）の石経の母体にはならないか——「契丹大蔵経」と連接する可能性はどうか。※
- ※竺沙雅章著『宋元仏教文化史研究』（汲古書院、2000 年）所載論文「新出資料よりみた遼代の仏教」「漢訳大蔵経の歴史—写経から刊経へ—」「契丹大蔵経小考」「『開宝蔵』と『契丹蔵』」などを参照。
- ・なお、智昇撰「開元釈教録略出」（智昇が住した西崇福寺蔵経索引）所載經典（各經典には千字文

が付される)と房山遼金刻經(千字文)との接合の可能性はないか(經典と千字文に1字分のズレがあるが)。

②開元後半から天寶期の新動向

- ・ 静琬の時代から一世紀近く経過し、それまでの単発小型の經典から大型經典の刻出に踏み出す刻經エネルギーの高まりが、前提に醸成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か。それが金仙公主を通じた大量經典の入手につながらないか。
- ・ 開元十～十七年(722～729)に『正法念處經』70卷(元魏般若流支訳)を石經とした。この刻經から「合邑一邑人」の形が出現し、その後の刻經母体の組織形態を用意した。
- ・ さらに引き続く比較的大型經典の石經となったものを示しておく。

開元二十二年(734):『大方等大集日藏經』10卷(隋那連提耶舍訳)

開元二十七?～二十九年(739～741):『大方等大集經』30卷(北涼曇無讖訳)

天寶期(742～755):『大方等大集經月藏分』10卷(隋那連提耶舍訳)

- ・ 金仙公主による經典寄進をまってまず着手されたのが『大集經』であったことの意味の重さ(末法に関わる中心經典。房山石經ではここに至って初めて刻出)。
- ・ こうした盛り上がりの上に、いよいよ開元末・天寶初か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600卷の刻經に踏み出す。これほどの大型經典を石經化するには、まず經典すべてが必要である上に、雲居寺側の覚悟、方針の確定、および信仰の母体への用意がすべて整ったことを意味する



- ・ 房山石經の長期にわたる事業が実現しえた大きな要因は、金仙公主の援助があげられる。
- ・ 金仙公主は經典と寄進寺領において、房山雲居寺史および石經事業の展開に計り知れない役割をはたしたものとして、改めて金仙公主の存在に注目され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 ・ 報告者はこのような視座から金仙公主を再度取り上げるとともに、従来不十分であった唐後半期の雲居寺の動向を全面的に明らかにする所存である。

Chinese Epigraphy: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nd Co-operations Projects

Silvio Vita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 « La Sapienza »

Introduction

To start with a pun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nscriptions on stones are a heavy subject. In fact, they can be viewed from so many angles that this character adds up to their conceptual "weight" layer after layer. However, before talking of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scholar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a word of apology, which will be at the same time a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Apology for saying things that will sound as conclusions rather than preliminary remark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reasons why I decided to do so. Perhaps it would have been advisable to discuss what can be don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a conclusion and not as a star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apers presented here are in themselves full of hi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ossibilities for helping each other through a continuous dialogue on selected subject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inscriptions. Nevertheless, after giving to it some thought, I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putting on the table a few proposal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ight constitute a stimulus for all.

In fact, I would be glad if my list of suggestions could be considered open. This is only a preliminary draft that in the end would be transformed in a document, one of the "final products" of this first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Chinese epigraphy. The subjects taken up in the workshop cover almost all the fields that a systematic study of stone inscriptions naturally implies, from 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material objects, to the collections of source materials through the media of reproduction, to the digital repertoires tha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mputer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expertise in the human sciences can provide. Finally, a few good examples of what stone inscriptions can tell us as "texts" are in the presentations by Professor Kegasawa, Otagi and Ledderose. Moreover, all the papers reflect single projects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but also the activity of centres

where research teams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it.

Research Centres and Projects

Therefore, I hope it will not be superfluous to char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centres as a first step.

As far as my information go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besides individual scholars, the two places where epigraphical projects are currently in progress are Paris and Heidelberg. Professor Ledderose admirable efforts at Fangshan and in Shandong have in fact transformed the team of people working with him in Germany in a "centre" that is able to attract attention beyond those specific projects on more general problems concerning Chinese epigraphy as a whole. In Paris, on the other hand, especially through the work of Jean-Pierre Drège, the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and 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have been jointly engag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a general catalogue of rubbings collections in Europe.

The collections of French institutions already catalogued are now available in CD Rom, and, although at a pace slower than it was originally expected, in due time we will have precise data and lists of all the items kept in the UK, in France, in Germany,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in Sweden. Professor Drège has sent us a short presentation of his plan that we will consider for inclusion in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workshop or in the digital bulletin for which I will advance a specific proposal below.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keep track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project, too. In any case, from next year the material available could be consulted from the web site of the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esides this, however, I should also mention another major enterprise that is now undertaken by the EFEO in Beijing: a three-year project started in 2004 with the objective of carrying out an overall epigraphical survey of the temples situated in the area of the former so-called Tartar City of Beijing. It concerns stelae and any other documents carved on stone which were locat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se establishments. Professor Zhao is closely co-operating with the project and will be able to explain its details in due time. To my understanding, its outcome will be a large-scal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m. All the above shows how French researchers will continue t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field, and I hope that Professor Guo Liying will report about our work here in Kyoto, in order to continue co-operation for our future initiatives with all the French research teams.

Lastly, with regard to Europea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 should also mention the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Kyoto. On this respect I cannot refrain from remembering what has been done by the late Antonino Forte, its Director for many years. As you know, he sadly passed away this past July, leaving his place in Japan as well as in the field of

epigraphical studies vacant forever. Of his was the idea of starting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exclusively devoted to East Asian epigraphy, perhaps the only example of this kind in the world of sinological publications. And it is actually thanks to his passionate interest for inscriptions that our centre is able to give its contribution as a little driving force in the field. Antonino Forte also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ed the idea of organizing an international meeting to strengthen and somewhat formalize the relations he himself had with other scholars sharing the same interest for inscriptions as historical sources.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we intend to honour this legacy continuing the publication in English of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inscriptions, possibly with the help of an international board of specialists who can guarantee for the standards of the research published.

What has been done in China and Taiwan in terms of cataloguing and publications of sources does not even need to be mentioned, so fundamental being its importance for all of us. Catalogues, reprints of old epigraphical collections and new editions of texts have been a constant contribution of taiwanese scholarship over the years, whereas the output of Chinese specialists in terms of sheer quantity again needs no special explanation.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the ultimate source for all new discoveries which have been enriching our knowledge of epigraphical texts,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The presence of Professor Zhao Chao at the workshop, for which I would like to thank him, would be a sufficient token that meetings like the one held in Kyoto could profit again from his own network of colleagues in China. He can certainly give precious help in this sense, but I think we can also expect from him fruitful discussions on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of "chinese epigraphy". He is the author of seminal works which have attempted to shape in new, more modern terms this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among others his wonderful synthesis, *Zhongguo gudai shike gailun*, in which most of the themes that should concern us are touch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fining the object and the methods of, or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inscriptions. The remarks he makes in his paper in terms of typological analysis again follow the line of his previous work.

Our Japanese colleague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played the role of the host for the 2006 workshop, and Kyoto in particular has much to say as a cultural as well as an academic centre. Kyoto University and it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Jinbun kagaku kenkyûjo) began to attract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uch before travelling was not easy as today, and the long-standing sinological tradition continues to be very well represented by younger generations. In the style of the "reading seminars" through which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there, inscriptions have been the special object of study of more than one team of specialists. Therefore, the fact that scholars working in Kyoto were so well represented in the

workshop was due not just to a sort of local advantage, but also to the fact that Kyoto is actual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es of attraction for epigraphical research. Its old and new connections with China make this city much closer to the mainland than perhaps any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well reflected, as all of us know, in the holdings of the Jinbun's library. Here is kept one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rubbings that Professors Inami and Yasuoka presented to our attention together with the tool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for putting on line rubbings as "readable" texts. This constitutes a model that in the future could be applied to similar collections in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For example, I think that adopting such technology for the projected digital catalogue of rubbings in European libraries could be of great help in the future. In any case, networking is the key-word here, and who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necessity of this than Professor Kegasawa Yasunori, being the tireless organiser that he is? In the last few years around his institute at Meiji University in Tokyo he has contributed to build a real network of scholars active especially in the Kanto region, producing studies and research tools in both printed and digital format. I would like to remember his catalogues of grave inscription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new journal specifically devoted to epigraphical sources whose first issue was published in 2006.

Scholarly Network for East Asian Epigraphy

The above overview of people and groups engaged in epigraphical research around the world is in fact far from being complete. Perhaps it would even be inappropriate to call it an overview, as going through the work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even in the most cursory of manners would have taken much more space than that allocated to me here. However, these brief considerations show with enough approximation that the scholars who attended the workshop are legitimately representative of a community sharing an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inscriptions. I come, therefore, to what I see as one main objective of the meeting, an objective that we also tried to stress in the few words of presentation of the event. To state it simply, 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occasion to make sure that a meeting like this will not remain "occasional", if I can play again a little bit with words. Saying it more ambitiously, one of the aims of this workshop was that of building permanent links between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engaged in projects related to Chinese epigraphy. A *de facto* network already exists, in the sense that many already know more or less precisely what is being done in the same field elsewhere, and personal relations are already established in most of cases. However, even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possible exceptions, these relations are in a sense "occasional" in nature. On the contrary, the net of scholars I have in mind will be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possibly, common themes for research on a recurrent basis.

A Few Proposals

To do this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here a few suggestions, to be considered as subjects for discussion in the next few months. In concrete terms, I am thinking of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which I believe will help to create a permanent network:

- a. establishing what we may call in loose terms an association;
- b. continuing organizing meetings and workshops on a regular basis, possibly every two years;
- c. publishing a digital newsletter or bulletin;
- d.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a "portal" which could constitute a link between site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organisations and groups;
- e. finding common topics that could be themes for future meetings or joint publications;
- f. as a more long-term project, editing a handbook of Chinese epigraphy that could be published first in parts in an electronic version and then in printed form;
- g. lastly—and this is more a request than a proposal—helping in continuing the publication of our epigraphical series in the years to come.

Thus, with no more than a superficial brain-storming the number of proposals has reached the considerable figure of six or seven, a sufficient amount of short and medium term objectives for creating the proposed network but also for attracting other people into it. Let us now to make some further comments on some of my suggestions in more detail.

First, having a group of persons linked formally in a network should constitute no major problem. We could adopt a name such as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ast Asian Epigraphy",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ast Asian Epigraphy", or the like, with a similar sino-japanese version of it. I would very much recommend to extend the range of interests to the whole of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region, where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used in writing systems and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edless to say, 20th century political boundaries do not necessarily correspond to the extens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through the ages, and inscriptions are one of those cultural elements that to some extent characterise the whole range of sinitic cultures. As for the people to be involved in this effort from the start, I suggest to begin with the institutions represented in the workshop. Taking an initiative means also shar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 Therefore, I would expect that two or three persons will be in charge for the project at least until next meeting. I will take on myself the share of this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are non objections, but I assume that there will be the need of one colleague from Japan and another from China to reach a total figure of three. One first task of this "steering committee" would be that of drawing a list of scholars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East Asia or other regions who could be potentially interested in joining, or at least in staying in touch for all the initiatives that we may plan.

The first of these will be that of holding meetings possibly every two years, and I am tempted to say that these should be held every time in a different place, although for practical reasons it is better not to stick too strictly to such a general principle. Let us say that we will try to have workshops or colloquia each time in a different country, or a different place in the same country, but this will depend every time on the "conditions" of the moment. In other words, organising meetings requires some financial support. Although not a big investment, some funding will be needed in any case, and we may want to choose the place that offers the better condition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However, at least for the moment, I would advise to keep the meetings on a limited scale, like in Kyoto in 2006: organising big conferences could be a burden too big to be taken on our shoulders so often. Besides this, some thought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oblem of choosing an appropriate subject every time. If 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s is exchanging information they can be occasions for presenting work-in-progress reports, new discoveries, new publications and so on. However, they can also be used to select a certain topic of research one or two years in advance and have a number of people work on it in contact to each other. This might be an idea to keep in mind in relation to what I will say below concerning common research projects.

Next, editing a newsletter is a project not too difficult to realise provided that this publication maintains a real "newsletter" format. I imagine a digital bulletin of 4-5 pages that could be posted on the web site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or on just one of them and cross-linked. The language used can be Chinese, Japanese or English, with no translations, as any translation will double the workload and involve problems of interpretation that for the practical purpose of such a bulletin could be left to the specialist reader. The precise contents of the newsletter needs some in depth consideration over time. Inform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eople involved in its planning will stimulate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a first thought, I would imagine some sort of key-note contribution on a selected topic together with a section containing information on conferences, projects, and new publications. The contents should be well-balanced, covering both analysis of specific inscriptions and more general remarks on issues of theoretical nature. I will return on this below in order to explain what I intend for "theoretical issues". I believe that the steering committee I just described will have to take charge of this initiative as well,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bulletin will be put out every year. A first issue could be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2007.

The suggestion of building a portal is somewhat linked to that of the newsletter. They both imply availability on the web. Most of the institutions represented in the Kyoto workshop already have their web sites for several years, alas with the noticeable exception of the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which will finally have its own site sometim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7. The idea of a portal supported by this propos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ast Asian Epigraphy" can be useful to all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and will add visibility to their respective sites through cross-linking. Particular care can also be devoted to developing together electronic tools. Not all of them will be as sophisticated as that presented by Professor Yasuoka, but nevertheless reference tools, bibliographical lists, and data-bases might be easier to realise with a joint effort. The catalogues of inscriptions made available on the web by the team of Professor Kegasawa should constitut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similar attempts in the years to come. Needless to say, a show window of this kind can also be used rather freely to post the digital bulletin already mentioned.

Lastly, finding common topics for research may not be considered a reasonable suggestion at a first sight. Everyone has his or her project going on, with few time left for other time-consuming initiatives.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establishing a permanent link within a community of scholars may naturally lead to joint initiatives. Besides this outcome, which has to be reasonably expected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I still think that it could be worth trying to share some common objectives already in the short term. In fact, we may characterise the lines of research within this field as "collecting" sources, "analysing" them, "theorising" on them in general terms, and, if I may add a topic which seems to me not having been raised openly to date, considering the sourc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ach of these compartments may suggest themes for investigation to be conducted in co-operation, or themes for future workshops, or even both, if we take in consider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orming some of the workshops into the final outcome of research focussed on the same topic.

As a conclusion, I believe than these few remarks could be useful to raise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of co-operation along lines shared by all subjects involved. These should not necessarily be the lines I illustrated here in rough terms, but I hope that my attempt will at least provide food for thought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ast Asian epigraphy.

近年出土の唐代節度使の巨大墓誌銘 2 例

—節度使権力の虚像と実像—

愛宕 元

京都大学大学院 人間・環境学研究科

既知の唐代墓誌の総数 6828 点（誌石 6459 点、蓋のみ 368 点）+ α

気賀澤保規編『新版 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明治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 2003. 3）
70cm 以上：81 例、80cm 以上：19 例、90cm 以上：12 例、100cm 以上：7 例の計 119 例
（6828 点中のわずか 1.74%）

（1）1979 年、河北省正定県（唐代冀州の地）木莊村出土の成徳軍節度使王元逵墓誌

「唐成徳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処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駙馬都尉、上柱国、太原郡開国公、食邑二千戸、食實封二百戸、贈太師王公（元逵）墓誌銘并序」、152×152cm、厚さ 35.8cm、45 行・43 字（1724 字）、大中 8 年（854）12 月没、翌 9 年 8 月葬（『考古与文物』1983-1、隋唐・河北 113、周・大中 096、新編 14-9538、補遺 4-197）

成徳軍節度使系譜（鎮・冀・深・趙四州管）

李宝臣 広徳元年（763）～建中 2（781）（安史の乱を裏切り節度使に任命、奚族出身）

李惟岳 建中 2 年（節帥を世襲するも、兵馬使王武俊に被殺）

王武俊 建中 3 年（782）～貞元 17 年（801）

王士真 貞元 17 年～元和 4 年（809）

王承宗 元和 4 年～同 15 年（820）（同年の王承宗没後、弟王承元は帰順請命）

田弘正 元和 15 年～長慶元年（821）

牛元翼 長慶元年～同 2 年（822）

王廷湊 長慶 2 年～大和 8 年（834）（回紇阿布思族出身、4 代祖が王武俊の養子）

王元逵 大和 8 年～大中 9 年（855）（世襲）

王紹鼎 大中 9 年～同 11 年（857）（世襲）

王紹懿 大中 11 年～咸通 7 年（866）（世襲）

王景崇 咸通 7 年～中和 3 年（883）（世襲）

王鎔 中和 3 年～天祐 4 年（907）（世襲、「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王元逵墓誌：「公諱元、字茂遠。其先晋陽人也。……昔在高辛、帝嚳以基徳、姬文統興。

而侈大雲孫、子晋脱屣上登。仰仙域之難窮、謂冑嗣以命氏。綿歴秦漢、魏晋以還、至于江表、代統其美也。」

【参考】1991 年河南省伊川縣出土の王士真妻齊国夫人呉氏墓誌

「唐故成徳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贈侍中王公先齊国太夫人濮陽呉氏墓誌銘并序」、75×75cm、30 行・31 字（685 字）、長慶 4 年（824）5 月葬（『文物』1995-11、新獲 96、新編 13-8616、補遺 5-34）

（2）1973 年、河北省大名県（唐代魏州の地）出土の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墓誌【圖 1～2】

「唐故魏博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贈太師・廬江何公(弘敬)墓誌銘并序」、195×195cm、厚さ 53cm、59 行・61 字 (3900 字余)、咸通 6 年 (865) 3 月没、同年 8 月葬 (『考古』1984-8、隋唐・河北 123、周統・咸通 032、新編 14-9849、補遺 5-39)

現在、邯鄲市内叢台公園内でガラスケースに入れて保存展示

魏博節度使系譜 (魏・博・貝・衛・潼・相六州管)

史憲成 長慶 2 年 (822) ~ 大和 3 年 (829) (衙内都知兵馬使何進滔に被殺)

何進滔 大和 3 年 ~ 開成 5 年 (846)

何弘敬 開成 5 年 ~ 咸通 6 年 (865) (『通鑑』は咸通 7 年没に繫年するが、本墓誌で訂正)

何全皞 咸通 6 年 ~ 同 11 年 (870) (兵乱で被殺) (「凡三世、四十二年」)

何弘敬墓誌「公諱弘敬、字子肅、廬江人也。周唐叔虞之後、十代孫萬食采於韓、封為韓氏、至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流散、吳音輕淺、呼韓為何、因以為氏。」

『新唐書』210「靈武人也」←昭武六姓 (康・安・何・米・史・曹)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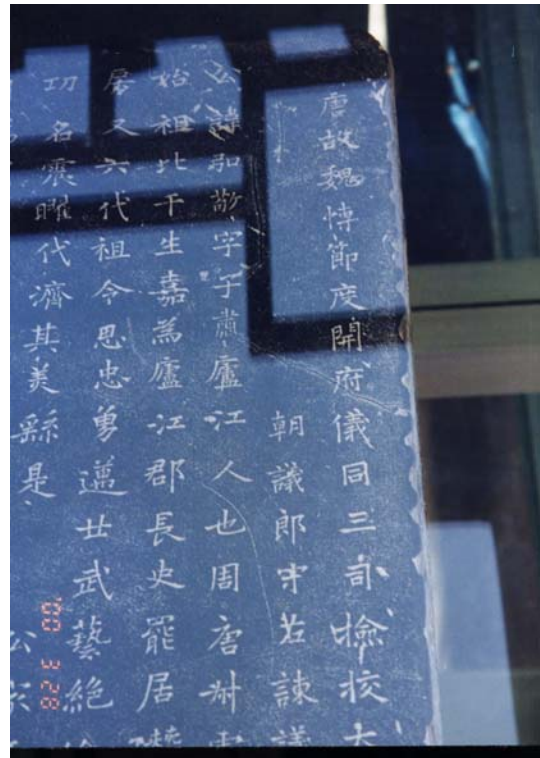


圖 2

[参考]唐代最大の成徳軍節度使李宝臣紀功碑、「推勾官・朝散大夫・行太子司儀郎王士則書并篆 (成徳軍節度使王武俊の子、嗣帥王士真の弟)」、永泰 2 年 (766) 7 月建

通高 7m 余、幅 2.8m、河北省正定県城内区燕趙南路西側に現存、1953 年に碑亭で覆ったために碑全体が見えず、1910 年頃の常盤大定氏の写真で巨大さが実感出来る【圖 3~6】

宋代欧陽修、趙明誠ら金石家は全く言及せず、元の納新『河朔訪古録』が初見、明王世『弇州山人稿』、顧炎武『金石文字記』4、王昶『金石萃編』93 等に著録、25 行・55 字 (1375 字)

唐代の巨碑との比較

昭陵陪葬李勣墓神道碑：通高 5.65m、幅 1.75m、厚さ 0.55m

乾陵無字碑：通高 7.53m、幅 2.1m、厚さ 1.49m

乾陵述聖記碑：通高 6.91m、幅 1.86m

恭陵（高宗太子李弘墓）孝敬皇帝叡德碑：通高 6.1m、幅 1.78m、厚さ 0.55m



圖 3



圖 4



圖 5



圖 6

70cm 以上の唐代墓誌銘

- 処士任道墓誌 貞觀 22 年 (648) 閏 12 月 69.5×70cm 26 行・27 字 北京 11-182 附考 2-135 千唐 46 隋唐・洛陽 2-129 周・貞觀 159 新編 20-13851 補遺 2-97
- 唐州刺史周仲隱墓誌 貞觀 23 年 (649) 11 月 74×73.5cm 30 行・32 字 北京 11-200 附考 2-152 輯繩 140 隋唐・洛陽 2-148 周・貞觀 175 新編 20-13864 補遺 3-347
- 衛州新鄉縣令王順孫墓誌 永徽 2 年 (648) 2 月 73×73cm 34 行・35 字 北京 12-21 附考 2-169 千唐 62 隋唐・洛陽 3-13 周・永徽 018 新編 20-13878 補遺 2-107
- 左驍衛大將軍牛進達墓誌 永徽 2 年 (651) 4 月 70.5×70.5cm 38 行・39 字 昭陵 20 隋唐・陝西 1-18 周統・永徽 007 新中国・陝西壹-42 新編 20-13883 補遺 2-108
- 左衛大將軍王君愕妻義豐夫人張廉穆墓誌 永徽 6 年 (655) 2 月 73.5×73.5cm 26 行・28 字 昭陵 24 隋唐・陝西 1-21 周統・永徽 033 新中国・陝西壹-46 新編 20-13946 補遺 2-131
- 隋屯田侍郎柳府君墓誌 顯慶元年 (656) 2 月 74×74cm 29 行・32 字 北京 13-3 附考 3-290 千唐 111 隋唐・洛陽 3-144 周・顯慶 002 新編 20-13971 補遺 2-137
- 戶部尚書唐儉墓誌 顯慶元年 (656) 11 月 73.2×73.2cm 45 行・45 字 昭陵 28 隋唐・陝西 3-42 周統・顯慶 006 新中国・陝西壹-49 新編 3-1753 補遺 1-27
- 涼州刺史鄭仁泰墓誌 麟德元年 (664) 10 月 72.1×72.1cm 35 行・37 字 昭陵 44 附考 6-540 隋唐・陝西 1-36 周・麟德 018 新中国・陝西壹-64 新編 20-14139 補遺 2-192
- 益州都督程知節墓誌 麟德 2 年 (665) 10 月 78×78cm 44 行・46 字 昭陵 46 隋唐・陝西 1-37 周統・麟德 019 新中国・陝西壹-65 新編 20-14169 補遺 2-203
- 左衛長史顏仁楚墓誌 乾封元年 (666) 2 月 72×72.5cm 29 行・29 字 北京 15-5 附考 6-596 千唐 230 隋唐・洛陽 5-5 周・乾封 06 新編 20-14179 補遺 2-209
- 歙州刺史王大札墓誌 咸亨元年 (670) 10 月 75×75cm 40 行・41 字 昭陵 56 隋唐・陝西 1-48 周統・咸亨 002 新中国・陝西壹-77 新編 3-2038 補遺 1-48
- 左監門衛大將軍斛斯政則墓誌 咸亨元年 (670) 11 月 71×71cm 50 行・50 字 昭陵 57 隋唐・陝西 3-80 周統・咸亨 005 新中国・陝西壹-78 新編 20-14265 補遺 2-231
- 貝州司馬王韋及妻狄氏墓誌 咸亨 4 年 (674) 10 月 72×72cm 32 行・33 字 輯繩 333 隋唐・洛陽 5-164 周統・咸亨 024 新編 21-14322 補遺 5-167
- 右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墓誌 上元 2 年 (675) 10 月 76.5×76.5cm 43 行・44 字 昭陵 63 附考 9-804 隋唐・陝西 1-54 周・上元 014 新中国・陝西壹-85 新編 3-2036 補遺 1-50
- 定州刺史尔朱義琛墓誌 上元 3 年 (676) 10 月 70×76cm 37 行・238 字 附考 9-828 千唐 297 隋唐・洛陽 5-211 周・上元 036 新編 21-14370 補遺 2-262
- 殿中少監唐嘉会墓誌 儀鳳 3 年 (678) 2 月 72.6×72.6cm 32 行・35 字 昭陵 68 隋唐・陝西 1-61 周統・儀鳳 008 新中国・陝西壹-85 新編 21-14387 補遺 2-269
- 伊州刺史衡義整及妻元氏墓誌 天授 2 年 (691) 2 月 69.5×71cm 24 行・24 字 北京 17-137 附考 11-1078 千唐 384 隋唐・洛陽 6-197 周・天授 013 新編 5-2932 補遺 1-74
- 隆州西水縣宰董希令及妻蕭氏墓誌 萬歲通天 2 年 (697) 10 月 69×70cm 31 行・31 字 北京 18-114 附考 13-1220 千唐 444 隋唐・洛陽 7-117 周・萬歲通天 032 新編 21-14664 補遺 2-349
- 韶州樂昌縣令王師協墓誌 神功元年 (697) 10 月 73×72.5cm 27 行・29 字 輯繩 396 隋唐・洛陽 7-108 周統・神功 002 補遺 5-16

- 利州刺史崔玄籍及妻屈突氏墓誌 聖暦2年(699)正月 75.5×77.5cm 42行・43字 北京18-141 附考13-1236 千唐453 隋唐・洛陽7-136 周・聖暦010 新編21-14682 補遺3-507
- 上將軍崔善福墓誌 聖暦2年(699)正月 78×79cm 40行・42字 輯繩398 隋唐・洛陽7-132 周統・聖暦004 新編21-14685 補遺5-243
- 左武威衛大將軍黑齒常之墓誌 聖暦2年(699)2月 72×71cm 40行・41字 北京18-152 附考13-1243 隋唐・洛陽7-147 周・聖暦022 新編21-14700 補遺2-358 曲石25 南京26
- 瀛州文安県令王德表墓誌 聖暦2年(699)3月 73×73cm 35行・36字 北京18-159 附考13-1249 千唐462 隋唐・洛陽7-150 周・聖暦028 新編5-3126 補遺1-78
- 貴安府折衝都尉王建墓誌 聖暦3年(700)2月 72×72.5cm 33行・33字 北京18-181 附考13-1270 千唐473 隋唐・洛陽7-172 周・聖暦048 新編21-14715 補遺2-368
- 承奉郎吳統墓誌 久視元年(700)7月 74.5×73.5cm 34行・36字 北京19-5 附考13-1277 輯繩402 隋唐・洛陽7-177 周・久視004 新編6-3350 補遺3-31
- 相州刺史袁公瑜及妻孟氏墓誌 久視元年(700)10月 70×74cm 33行・32字 北京19-11 附考13-1288 千唐481 隋唐・洛陽7-186 周・久視013 新編3-1971 補遺1-80
- 冠軍大將軍馬神威墓誌 久視元年(700)10月 71.5×73cm 36行・37字 附行3-1289 新獲37 隋唐・洛陽7-188 周・久視016 新編21-14728 補遺5-256
- 營繕大匠泉男產墓誌 長安2年(702)4月 74×74cm 28行・29字 北京19-39 府考14-1313 輯繩411 隋唐・洛陽7-204 周・長安008 新編21-14757 補遺5-261
- 宋州碭山県令李義琳墓誌 長安2年(702)5月 75×73.5cm 29行・31字 新獲40 隋唐・洛陽7-205 周統・長安003 新編4-2382
- 兗州都督劉璿墓誌 長安2年(702)11月 74×74cm 33行・35字 輯繩414 隋唐・洛陽7-210 周統・長安007 新編21-14750 補遺5-263
- 雍州乾封県丞崔汲及妻李氏墓誌 長安3年(703)2月 73×73cm 32行・33字 輯繩415 隋唐・洛陽8-3 周統・長安012 新編21-14757 補遺5-265
- 岷州刺史張仁楚及妻趙氏墓誌 長安3年(703)10月 73×73cm 34行・34字 北京19-83 附考14-1353 千唐505 隋唐・洛陽8-23 周・長安044 新編21-14775 補遺2-382
- 姚州刺史皇甫文備墓誌 長安4年(704)8月 70×69cm 33行・34字 北京19-110 附考14-1370 千唐513 隋唐・洛陽8-38 周・長安063 新編21-14787 補遺2-387
- 亳州刺史李ソソ及妻盧氏墓誌 神竜2年(706)正月 69×70cm 28行・30字 北京20-23 附考14-1397 千唐523 隋唐・洛陽8-68 周・神竜021 新編21-14806 補遺2-389
- 贈太子中舍人甘基及妻唐氏墓誌 神竜2年(706)7月 72×71cm 24行・25字 北京20-31 附考15-1406 千唐528 隋唐・洛陽8-75 周・神竜030 新編21-14811 補遺2-392
- 右金吾衛將軍閻虔福墓誌 景竜元年(707)11月 71.5×71.5cm 30行・31字 北京20-59 附工5-1433 輯繩441 隋唐・洛陽8-103 周・景竜002 新編5-3033 補遺6-32

- 洋州長史王震墓誌 景龍 3 年 (708) 10 月 70.2×71.5cm 30 行・30 字 北京 20-93
附考 15-1467 千唐 550 隋唐・洛陽 8-130 周・景龍 032 新編 5-2944 補遺 1-89
- 荊州大都督府大司馬鄧森墓誌 景雲 2 年 (711) 2 月 72×72.5cm 34 行・33 字 北京 20-115 附考 15-1498 千唐 561 隋唐・洛陽 8-148 周・景雲 007 新編 5-3175 補遺 1-93
- 左威衛錄事參軍孟君妻劉氏墓誌 先天元年 (712) 11 月 74×72cm 24 行・25 字 輯繩 453 隋唐・洛陽 8-178 周統・先天 002 新編 21-14882 補遺 5-309
- 鎮軍大將軍李多祚墓誌 先天 2 年 (713) 9 月 75×75cm 11 行・15 字 新獲 47 新編 21-14886 補遺 6-383
- 渭州刺史將作少匠孟玄一及妻顧氏墓誌 開元 3 年 (715) 4 月 71.5×72cm 29 行・30 字 北京 21-35 附考 16-1550 千唐 577 隋唐・洛陽 8-196 周・開元 019 新編 21-14902 補遺 2-420
- 元思忠及妻信安郡主李氏墓誌 開元 5 年 (717) 8 月 69.5×70cm 33 行・33 字 北京 21-74 附考 16-1582 千唐 594 隋唐・洛陽 9-10 周・開元 6 新編 6-3512 補遺 1-98
- 鄭州管城縣令楊璉墓誌 開元 8 年 (720) 10 月 70×74cm 31 行・31 字 北京 21-138 附考 17-1635 千唐 608 隋唐・洛陽 9-50 周・開元 110 新編 21-14952 補遺 2-439
- 史君妻契苾氏墓誌 開元 9 年 (721) 2 月 75×75cm 21 行・22 字 昭陵 84 隋唐・陝西 1-99 周統・開元 036 新中国・陝西壹-118 新編 21-14956 補遺 2-442
- 瀛州東城縣令張景旦及妻王氏・皇甫氏墓誌 開元 9 年 (721) 10 月 70×70cm 29 行・33 字 北京 21-153 附考 17-1650 千唐 615 隋唐・洛陽 9-64 周・開元 126 新編 21-14964 補遺 2-445
- 相州刺史賀蘭務溫墓誌 開元 9 年 (721) 10 月 72.5×72.5cm 35 行・35 字 北京 21-158 附考 17-1652 千唐 615 隋唐・洛陽 9-67 周・開元 127 新編 6-3516 補遺 1-104
- 寧州刺史裴撝及妻權氏墓誌 開元年 (721) 10 月 74×76cm 42 行・42 字 北京 21-161 附考 17-1654 千唐 617 隋唐・洛陽 9-70 周・開元 129 新編 21-14967 補遺 2-446
- 大聖真觀楊曜墓誌 開元 10 年 (722) 5 月 69×74cm 25 行・21 字 北京 22-8 千唐 624 隋唐・洛陽 9-82 周・開元 150 新編 6-3422 補遺 1-105
- 右監門衛將軍執失善光墓誌 開元 11 年 (723) 2 月 77.9×77.9cm 33 行・34 字 昭陵 85 隋唐・陝西 3-144 周統・開元 052 新中国・陝西壹-120 新編 21-14988 補遺 2-452
- 右金吾衛將軍魏靖墓誌 開元 15 年 (727) 正月 73×73cm 26 行・27 字 北京 22-114 附工 8-1768 輯繩 481 隋唐・洛陽 9-160 周・開元 241 新編 5-3161 補遺 7-41
- 光祿少卿高懲墓誌 開元 18 年 (730) 2 月 78×77cm 29 行・32 字 北京 23-41 千唐 701 隋唐・洛陽 10-16 周・開元 318 新編 22-15066 補遺 2-484
- 相州刺史李暢墓誌 開元 18 年 (730) 7 月 73×73cm 35 行・36 字 輯繩 493 隋唐・洛陽 10-4 周統・開元 095 新編 5-3102 補遺 6-50
- 泗州司馬苗善物及妻徐氏墓誌 開元 20 年 (732) 11 月 69×70cm 30 行・31 字 北京 23-85 千唐 719 隋唐・洛陽 10-54 周・開元 355 新編 6-3817 補遺 1-129
- 房州刺史盧全操墓誌 開元 23 年 (735) 9 月 73.5×73cm 31 行・31 字 北京 23-151

- 千唐 748 隋唐・洛陽 10-112 周・開元 421 新編 22-15120 補遺 2-507
 滁州別駕蕭謙及妻劉氏墓誌 開元 23 年 (735) 9 月 72×72cm 25 行・26 字 輯繩 518
 隋唐・洛陽 10-111 周・開元 420 新編 6-3482 補遺 6-56
 張君妻李氏墓誌 開元 24 年 (736) 10 月 74×74cm 20 行・21 字 新獲 23 新編 7-4773 補遺 6-59
 蔚州刺史王元琰墓誌 開元 27 年 (739) 2 月 73×73.5cm 28 行・29 字 千唐 774 隋唐・洛陽 10-156 周・開元 485 新編 22-15151 補遺 2-518
 滎陽郡夫人鄭德曜墓誌 開元 28 年 (740) 11 月 767×6cm 28 行・38 字 輯繩 522 隋唐・洛陽 10-193 補遺 6-64
 汾州刺史沈浩豐墓誌 開元 29 年 (741) 11 月 71×71cm 34 行・37 字 北京 24-152 千唐 792 隋唐・洛陽 10-206 周・開元 536 新編 22-15175 補遺 2-525
 三〇県令盧全善妻陳照墓誌 天寶 4 年 (745) 10 月 75×75cm 31 行・35 字 輯繩 536 隋唐・洛陽 11-66 周・天寶 074 新編 7-4191 補遺 6-72
 太子詹事源光乘墓誌 天寶 6 年 (747) 2 月 74.5×74.5cm 33 行・36 字 北京 25-123 千唐 833 隋唐・洛陽 11-86 周・天寶 105 新編 7-4297 補遺 1-165
 上党郡大都督府長史宋遙墓誌 天寶 7 年 (748) 正月 72×73.5cm 23 行・25 字 北京 25-137 千唐 837 隋唐・洛陽 11-96 周・天寶 118 新編 7-4212 補遺 1-168
 滎陽郡長史崔湛墓誌 天寶 10 年 (751) 8 月 77×77cm 30 行・38 字 北京 26-46 輯繩 562 隋唐・洛陽 11-154 周・天寶 180 新編 7-4534 補遺 2-23
 檢校戸部尚書知省事張猷誠墓誌 大曆 4 年 (769) 2 月 73・72cm 29 行・33 字 輯繩 580 隋唐・洛陽 12-33 周統・大曆 007 新編 7-4077 補遺 6-92
 崔渾妻盧氏墓誌 大曆 13 年 (778) 4 月 71×72.5cm 28 行・28 字 北京 27-166 千唐 935 隋唐・洛陽 12-71 周・大曆 058 新編 5-3102 補遺 1-108
 兵部尚書馬炫墓誌 貞元 8 年 (792) 2 月 76・5×76・5cm 34 行・38 字 新獲 82 隋唐・洛陽 12-123 周統・貞元 025 新編 9-5641 補遺 6-104
 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呂渭墓誌 貞元 16 年 (800) 12 月 75×77cm 43 行・44 字 輯繩 611 隋唐・洛陽 12-158 周統・貞元 060 新編 11-7123 補遺 4-81
 靳朝俊及妻王氏墓誌 貞元 19 年 (803) 11 月 75×68.5cm 34 行・34 字 隋唐・江蘇 65 周統・貞元 076 新編 9-5736 補遺 7-72 齊魯 372
 台州刺史陳皆及妻丘氏墓誌 貞元 20 年 (804) 2 月 70×70cm 35 行・35 字 北京 28-186 千唐 985 隋唐・洛陽 12-185 周・貞元 130 新編 9-5737 補遺 1-247
 李敢言墓誌 元和 6 年 (811) 76×76cm 31 行・33 字 齊魯 372
 太常少卿崔君妻鄭正合附墓誌 元和 8 年 (813) 5 月 74×73cm 22 行・24 字 輯繩 631 隋唐・洛陽 13-12 周統・元和 044 新編 12-8173 補遺 4-94
 成德軍節度使王子真妻吳氏墓誌 長慶 4 年 (824) 5 月 75×75cm 30 行・31 字 新獲 96 新編 13-8516 補遺 5-34
 殿中少監王汶妻蔣氏墓誌 大和元年 (827) 2 月 73×73cm 36 行・38 字 輯繩 644 隋唐・洛陽 13-84 周統・大和 001 新編 13-8641 補遺 4-117
 吏部郎中王克墓誌 大和 6 年 (832) 10 月 74×74cm 34 行・36 字 北京 30-127 輯繩 651 隋唐・洛陽 13-118 周・大和 054 新編 12-8254 補遺 4-130
 河南府司録參軍李璆墓誌 會昌元年 (841) 11 月 70×70cm 28 行・30 字 北京 31-85 輯繩 670 隋唐・洛陽 13-176 周・會昌 009 新編 13-8620 補遺 4-163 唐宋 354
 明州刺史韋墳妻溫氏墓誌 會昌 6 年 (846) 5 月 77×77cm 33 行・34 字 輯繩 674 隋唐・北京 3-185 周・會昌 048 新編 14-9394 補遺 5-38
 工部尚書致仕孫公義墓誌 大中 5 年 (851) 7 月 74.9×75.8cm 47 行・50 字 北京 32

-63 千唐 1113 隋唐・洛陽 14-25 周・大中 054 新編 14-9497 補遺 1-348
 汀州刺史孫公夫人李氏墓誌 大中 10 年 (856) 12 月 78.5×79cm 千唐 1134 隋唐・洛陽 14-68 周・大中 125 補遺 1-368
 撫州刺史皇甫イ墓誌 咸通 6 年 (865) 7 月 70×70cm 30 行・33 字 新獲 112 新編 14-9847 補遺 4-232
 汀州刺史孫瑋及妻李氏墓誌 咸通 12 年 (871) 12 月 79×79cm 39 行・43 字 北京 33-113・114 輯繩 706 隋唐・洛陽 14-155・156 周統・咸通 089 補遺 5-45
 京兆少尹苗紳及妻庾氏墓誌 咸通 15 年 (874) 10 月 70×70cm 33 行・36 字 新獲 120 新編 13-9143 補遺 6-191

80cm 以上の唐代墓誌

徐謨墓誌 貞觀 11 年 (637) 10 月 80×80cm 34 行・31 字 隋唐・江蘇 10 周統・貞觀 018 新編 20-13778 補遺 4-298 齊魯 369
 特進觀国公楊恭仁墓誌 貞觀 14 年 (640) 3 月 87.3×87.3cm 35 行・37 字 昭陵 3 隋唐・陝西 1-11 周統・貞觀 021 新中国・陝西壹-36 新編 20-13784 補遺 1-482
 幽州都督王君愕墓誌 貞觀 19 年 (645) 10 月 89.2×89.2cm 30 行・31 字 昭陵 10 隋唐・陝西 1-16 周統・貞觀 041 新中国・陝西壹-39 新編 20-13818 補遺 2-84
 梓州刺史李震墓誌 麟德 2 年 (665) 11 月 83.3×83.3cm 35 行・37 字 昭陵 48 隋唐・陝西 1-38 周統・麟德 020 新中国・陝西壹-66 新編 20-14171 補遺 2-205
 紀国太妃韋珪墓誌 乾封元年 (667) 12 月 84×84cm 38 行・35 字 昭陵 52 周統・乾封 008 新中国・陝西壹-71 新編 3-1556 補遺 2-1
 司空太子太師李勣墓誌 總章 3 年 (670) 2 月 82×82cm 54 行・54 字 昭陵 56 隋唐・陝西 1-45 周統・總章 010 新中国・陝西壹-75 新編 4-2297 補遺 1-55
 臨川郡長公主李孟姜墓誌 (太宗第 11 女) 永淳元年 (683) 12 月 89×89cm 40 行・42 字 昭陵 71 附考 10-945 隋唐・陝西 3-96 周・永淳 025 新中国・陝西壹-88 新編 3-1955 補遺 1-66
 右威衛將軍安元寿墓誌 光宅元年 (684) 10 月 87×87cm 38 行・39 字 昭陵 73 隋唐・陝西 3-98 周統・光宅 003 新中国・陝西壹-89 新編 3-1958 補遺 1-67
 鎮軍大將軍高足西墓誌 萬歲通天 2 年 (697) 正月 88.5×88.5cm 32 行・34 字 新獲 34 隋唐・洛陽 7-84 周統・萬歲通天 003 新編 21-14649 補遺 5-229
 司衛少卿樊文及前妻高氏墓誌 長安 2 年 (702) 3 月 87×88cm 35 行・36 字 輯繩 409 隋唐・洛陽 7-202 周統・長安 002 新編 21-14744 補遺 5-259
 東光県主李氏墓誌 神龍元年 (705) 10 月 85×85cm 29 行・31 字 輯繩 430 周統・神龍 004 新編 21-14802 補遺 7-342
 越王李貞墓誌 (太宗第 8 子) 開元 6 年 (718) 正月 87×87cm 29 行・32 字 昭陵 83 附考 16-1590 隋唐・陝西 1-59 周・開元 065 新中国・陝西壹-117 新編 21-14927 補遺 2-432
 王慶及妻呂氏墓誌 開元 9 年 (721) 11 月 80×50cm 33 行・22 字 北京 21-163 毛 17-1659 隋唐・江蘇 36 周・開元 134 新編 7-4527 齊魯 370
 工部尚書崔泰之墓誌 開元 11 年 (723) 10 月 89×88cm 33 行・37 字 北京 22-30 附考 7-1697 千唐 630 隋唐・洛陽 9-104 周・開元 174 新編 22-14996 補遺 1-106
 監河東河西道兵馬使高定方墓誌 開元 22 年 (734) 8 月 88×88cm 20 行・23 字 北京 23-134 輯繩 512 隋唐・洛陽 10-96 周・開元 407 新編 22-15113 補遺 4-26
 広平郡太守寇洋及妻邢氏墓誌 天寶 7 年 (748) 11 月 88×89.5cm 30 行・31 字 北京

25-158 千唐 844 隋唐・洛陽 11-111 周・天寶 136 新編 7-4217 補遺 1-172
 太子詹事張庭珪墓誌 天寶 10 年 (751) 10 月 80×80cm 32 行・37 字 新獲 66 隋唐・
 洛陽 11-163 新編 8-5137 補遺 5-30
 項法墓誌 天寶 10 年 (751) 88×86cm 28 行・29 字 齊魯 371
 太子太師崔安潛墓誌 乾寧 5 年 (898) 8 月 87×87cm 43 行・50 字 新獲 125 新編 15
 -10348 補遺 6-203

90cm 以上の唐代墓誌

長樂公主李麗質墓誌 (太宗第 5 女) 貞觀 17 年 (643) 9 月 98.1×98.1cm 31 行・33
 字 昭陵 7 隋唐・洛陽 3-22 周統・貞觀 036 新中国・陝西壹-37 新編 20-13802
 補遺 1-485
 輔国大將軍張士貴墓誌 顯慶 2 年 (657) 11 月 98.2×98.2cm 54 行・57 字 昭陵 30 附
 考 4-336 隋唐・陝西 1-25 周・顯慶 056 新中国・陝西壹-51 新編 3-1789 補
 遺 1-40
 尉遲敬德妻鄂国夫人蘇斌墓誌 顯慶 4 年 (659) 4 月 99.1×99.1cm 33 行・34 字 昭陵
 38 附考 4-369 隋唐・陝西 1-30 周・顯慶 096 新中国・陝西壹-56 新編 22-
 14026 補遺 2-157
 越国太妃燕氏墓誌 咸亨 2 年 (672) 12 月 96.5×96.5cm 49 行・48 字 昭陵 60 北京
 15-154 隋唐・陝西 1-51 周統・咸亨 012 新中国・陝西壹-80 新編 21-14281
 補遺 2-240
 章懷太子李賢墓誌 (高宗第 2 子 乾陵陪葬) 神龍 2 年 (706) 7 月 90×90cm 40 行・
 41 字 附考 15-1405 隋唐・陝西 1-84 周・神龍 029 新中国・陝西壹-110 新編
 21-14810 補遺 5-281
 右領軍衛上將軍何文哲及妻康氏後妻康氏墓誌 大和 4 年 (830) 10 月 93×87cm 60 行・
 57 字 考古 1986-9 隋唐・陝西 4-107、周統・大和 020、新編 13-8707、補遺 1-
 282
 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崔弘礼墓誌 大和 5 年 (831) 4 月 93×90cm 39 行・42 字 北
 京 30-112 千唐 1043 隋唐・洛陽 13-109 周・大和 039 新編 13-8753 補遺 1
 -297
 塩鉄軫運塩城監事盧伯卿墓誌 開成 5 年 (840) 11 月 90.7×60cm 29 行・30 字 北京
 31-70 千唐 1073 隋唐・洛陽 13-168 周・開成 049 新編 13-9004 補遺 1-319
 明州刺史韋墳墓誌 会昌元年 (841) 10 月 99×99cm 30 行・34 字 北京 31-84 輯繩
 669 隋唐・洛陽 13-175 周・会昌 008 新編 13-9036 補遺 4-162
 天平軍節度使楊漢公墓誌 咸通 2 年 (861) 11 月 87×90cm 50 行・52 字 輯繩 699 周
 統・咸通 008 新編 14-9438 補遺 6-178
 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孫簡墓誌 咸通 14 年 (873) 12 月 90×90cm 44 行・48
 字 輯繩 708 周統・咸通 099 新編 13-8951
 太子太師崔安潛墓誌 乾寧 5 年 (898) 8 月 87×87cm 43 行・50 字 新獲 125 新編 15
 -10348 補遺 6-203

100cm 以上の唐代墓誌

淮安王李壽墓誌 (高祖從父弟) 貞觀 5 年 (631) 12 月 166×96cm 31 行・37 字 附考
 1-29 隋唐・陝西 1-9 周・貞觀 024 新中国・陝西壹-19 新編 20-13753 補遺 1
 -474
 越王李福墓誌 (太宗第 11 子) 咸亨 2 年 (6672) 12 月 112.5×112.5cm 40 行・38 字

- 昭陵 59 隋唐・陝西 1-50 周統・咸亨 013 新中国・陝西壹-79 新編 21-14284 補遺 2-238
- 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基誌 顯慶 4 年 (659) 4 月 120×120cm 46 行・50 字 昭陵 36 附考 4-370 隋唐・陝西 3-50 周・顯慶 100 新中国・陝西壹-55 新編 20-14028 補遺 2-154
- 少司成 (国子監司業) 孫處約墓誌 咸亨 3 年 (672) 11 月 100×98cm 44 行・47 字 附考 8-750 隋唐・洛陽 5-140 周・咸亨 068 新編 21-14299 補遺 4-369
- 虢王李鳳墓誌 (高祖第 15 子) 上元 2 年 (675) 12 月 124×122cm 56 行・56 字 附考 9-815 隋唐・陝西 1-56 周統・上元 011 新中国・陝西壹-50 新編 21-14352 補遺 1-52
- 永泰公主李仙惠墓誌 (中宗第 7 女) 神龍 2 年 (706) 5 月 114×114cm 32 行・32 字 附考 15-1403 隋唐・陝西 3-125 周・神龍 027 新中国・陝西壹-109 新編 5-3029 補遺 1-83
- 開府儀同三司高力士墓誌 宝應元年 (763) 4 月 112×78cm 45 行・34 字 新編 8-5169 補遺 7-59 中国文物報 2000 年 4 月 16 日付

【凡例】

- 北京：北京図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図書館蔵中国歴代石刻拓本匯編』全 100 冊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91)
- 附考：毛漢光撰『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既刊 18 冊 (台湾・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 1984~94)
- 千唐：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陽地区文管處編『千唐誌齋蔵誌』上下 2 冊 (文物出版社 1984)
- 輯繩：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洛陽出土歴代墓誌輯繩』1 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新獲：李献奇・郭引強編著『洛陽新獲墓誌』前 100 冊 (文物出版社 1996)
- 隋唐：隋唐五代墓誌彙編総編輯委員会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全 30 冊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1~92)
- 周：周紹良主編・趙超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下 2 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周統：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統集』1 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新中国一河南壹：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国出土墓誌一河南壹』上下 2 冊 (文物出版社 1994)
- 新中国一河南壹：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国出土墓誌一河南壹』上下 2 冊 (文物出版社 1994)
- 新中国一河南貳：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国出土墓誌一河南貳』上下 2 冊 (文物出版社 2002)
- 新中国一陝西壹：中国文物研究所・陝西省古籍整理弁公室編『新中国出土墓誌一陝西壹』上下 2 冊 (文物出版社 2000)
- 新中国一陝西貳：中国文物研究所・陝西省古籍整理弁公室編『新中国出土墓誌一陝西貳』上下 2 冊 (文物出版社 2003)
- 新編：全唐文新編編輯委員会編『全唐文新編』全 22 冊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2001)
- 補遺：陝西省古籍整理弁公室編『全唐文補遺』全 7 冊 (三秦出版社 1994~2000)
- 唐宋：饒宗頤編『唐宋墓誌：遠東学院蔵拓本図録』1 冊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1)
- 昭陵：張沛編著『昭陵碑石』1 冊 (三秦出版社 1993)
- 南京：袁道俊編著『南京博物院蔵唐代墓誌』1 冊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3)
- 齊魯：頼非著『齊魯碑刻墓誌研究』 (齊魯書社 2004)

Commentary on the Rock Jingshiyu 經石峪 on Taishan 泰山 (Abstract)

Lothar Ledderose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One can identify two types of written commentaries, those which are separate from the main work and are normally done in a different material, and those commentaries which are in physical relation with the primary work and, as a rule, use the same material and technique.

Examples of the first type are Japanese screen paintings and European easel paintings. Commentaries to those are typically found in books, separate from the primary work and written in a different format. Examples of the second type are scrolls of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or calligraphy, such as the letters by Wang Xizhi 王羲之. His letter may be mounted on a hand scroll, and in the course of the centuries ever new commentaries are added on. In the end, the original letter is almost dwarfed amongst the later additions.

All commentators to such a letter have used brush and ink as Wang Xizhi did, and like him, they wrote on paper, sometimes even on the original paper, or on silk. In their calligraphy the commentators followed the same stylistic and aesthetic standards, thereby fus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work and forging an aesthetic unity between them. This was a strategy to strengthen the coherence of the artistic tradition.

At the same time commentators forged a spacial symbiosis. They carefully chose a space close to the original writing or painting, and they even compete among each other for space. Thus they make the viewer look simultaneously at their commentary and at the primary work, thereby controlling and channeling the viewer's thoughts. In front of a Japanese screen or of Western oil paintings, by contrast, the viewer is left to make up his own mind. Visitors to the screen paintings in Daisenin 大仙院 of Daitokuji 大徳寺 are not confronted with any commentary, yet a viewer of Wang Xizhi's *Fengjutie* 奉橘帖

cannot ignore the later comments written by collectors and connoisseurs. Willingly or not he takes in their opinions.

Chinese commentators applied the same two principles when they engraved inscriptions into rock. Emperor Xuanzong's 唐玄宗 large inscription on Mount Tai 泰山, for example, has since the 8th century been encased by dozens of secondary inscriptions. Like writers of colophons on scroll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the commentators on the rock create a twofold symbiosis, aesthetically and spatially. They make use of the same medium and conform to the same technical and stylistic standards as the primary work, thus creating an aesthetic unity. Vying for space, the commentators also form a spacial unity with the primary work. By establishing a unified space the later engravers, too, force the viewers to simultaneously look at their commentary and at the primary work. They, too, want to influence and channel the perception of the viewers, forcing them to think along certain lines.

Next to the Diamond Sutra 金剛經 of ca. 580 in Sutra Stone Valley 經石峪 on Mount Tai about 25 commentaries have been engraved in the course of the centuries, the first in 1117 by a certain official Chen Guorui 陳國瑞, and the last in 1958 by Guo Moruo 郭沫若. The paper dealt in detail with two conspicuous commentarie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one by the Vic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War Wan Gong 萬恭 (1515-1591).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large rock surface with the Diamond Sutra he engraved a long text on the rock wall when he erected a pavilion there in 1572. Its title *Lofty Mountain Flowing Water* 高山流水 alludes to a famous zither tune of antiquity.

In his entire commentary Wan Gong never mentions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the primary sutra text, but instead dwells on the beauty of the landscape and, in particular, on the extraordinary view of the water gurgling down over characters in the rocky surface. By extolling the aesthetic qualities of the site Wan Gong pulls the reader's attention away from its religious significance. Yet the spiritual power of the place is not completely dissolved into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ut is, at least in part, replaced by the spirit of indigenous Chinese culture, embodied in the zither and its tunes. Its roots go far back into a time before Buddhism ever reached Chinese soil.

In 1579, a certain censor-in-chief Li Bangzhen 李邦珍 added another, shorter commentary on a rock which juts out into the space of the sutra text, almost injuring it. Li Bangzhen begins with the two oversize characters "SCRIPTURE CORRECTED 經正."

Quoting Mengzi 孟子 he then continues to assert that the Confucian classical scriptures and not the Buddhist sutras embody the true standard. Whereas Wan Gong belittles the value of the sutra text, Li Bangzhen displays open contempt, bordering on hostility.

Both commentators try to control what the visitors should think, yet they go even further. By engraving their commentaries at specific spots, they even manipulate what the visitors see. In order to properly read the sutra one has to stand to the south of the rock face, but Wan Gong's pavilion was erected to the west, specifically inviting "those who ascend Mount Tai to take a rest here for ten thousand years to come." While resting in the open pavilion one can comfortably read Wan Gong's colophon on the rock wall behind, and one faces Li Bangzhen's commentary. Yet from the pavilion one can only aesthetically appreciate the script style of the sutra and the size of its characters, "each as large as a peck" as noted by Wan Gong,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follow th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columns with the eye and read the text.

In the topography which they create, Wan Gong and Li Bangzhen display the same dismiss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sutra as in the text of their commentaries. By making the visitors walk up to the pavilion, the two commentators prevent them from properly viewing and comprehending the primary Buddhist text.

9 January, 2007

Inscriptions on “stone banners” (*shichuang* 石幢) : Text and Context

Kuo Liying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All over China, and specially in 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ern China, one may see octagonal stone pillars inscribed with Buddhist scriptures (See **Photo 1, 2, 3 and 4** for early examples) ¹. Their height varies from one to three meters. They are usually called by western scholars “*dhāraṇī* pillars”. Their Chinese name is *jingchuang* 經幢 “*sūtra* [stone] banner” or *tuoluonichuang* 陀羅尼幢 “*dhāraṇī* [stone] banner”,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s they bear. The use *chuang* 幢, “banner” as a name for these pillars is attested in inscription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8th century. The Japanese monk En'nin 圓仁 (794-846) reported on the fifteen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year of 844 that due to the emperor Wuzong's persecution of the Buddhists,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diction of Buddhist practices, there was an imperial edict ordering the destruction of all kind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s, among them the “stone banners engraved with Zunsheng [text]” (尊勝石幢) and monks' funeral *stūpa* (僧墓塔) ². As the Chinese scholar ZHOU Yiliang 周一良 rightly concluded from this remark,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 great number of them³. We can thus imagine how popular these *vijaya-dhāraṇī* pillars were in En'nin's time, because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records of stone inscriptions show that soon after the end of persecution,

¹ LIU Shu-fen 劉淑芬 reproduces 60 photos taken from earlier publications in the appendix of the second of her three studies on stone pillars, “Jingchuang de xingzhi xinzhi he lai yuan — jingchuang yanjiu zhi er 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 — 經幢的研究之二” (Form, Nature, and Origins of Dharani Pillars. Studies on Dharani Pillars, Part I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68, Part 3 (1997) : 727-786. Some of these pillars do not exist any more or are partly destroyed and some are already. Others were since moved to other places, like local museums or elsewhere.

² ONO Katsutoshi 小野勝年, *Nittō-guhō-junrei-kōki no kenkyū*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 (A Study of the *Nittō-guhō-junrei-kōki* / *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T'ang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 vol. 4, Tōkyō : Suzuki Research Foundation, 1969, pp. 71 and 74.

³ “Tantrism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8 (March 1945), N° 3 and 4, pp. 322-323.

most of the damaged pillars were repaired and new ones were erected all 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Song to even Yuan times. To this day I collected c. about 220 *dhāraṇī*-pillars' inscriptions with datings ranging from 697 to 1285⁴. Those stone pillars are located mostly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viz. Shanxi 山西, Shaanxi 陝西, Shandong 山東, Hebei 河北, Henan 河南, Jiangsu 江蘇, Zhejiang 浙江, Sichuan 四川 and Fujian 福建, etc. But almost none was record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Most of the documentation is found in *Epigraphic Corpus* dating back to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or even a bit earlier⁵. Reports of archaeological finds from the last century up to recent years also provide some data. But there are huge blanks. First,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decipher entirely the text engraved, because many pillars are fragmentary. Second, the *Epigraphical Corpus* sources are not always reliable. Their authors are not always careful when collecting materials. Often they never saw the pillar and were content with copying predecessors. Generally they do not reproduce entirely the inscription, but only give the title of each text, when they are conscientious. The few literally compositions printed in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Quan Tang wen* 全唐文,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literary works", do not give any indication on the location nor on the shape of the pillars. Archaeological reports do not always give informations we need and sometimes give incorrect informations, specially regarding to the Buddhist texts. I did my best to see the extant pillars, still standing o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 or kept in museums, but I could not check every recorded pillar.

My collection of data on these stone pillars provide a huge field for possible studies, historical, textual, religious, economical, social, archaeological or artistic and so on. Here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dealing only with a few points. I shall give first a short survey of the contents, then consider issues relative to the main Buddhist

⁴ If I add the undated pillars, the total number would be three times bigger. Some pillars bear more than one date and provide the back-story, telling for example how the pillar was destroyed during the persecution period or how the pillar was found abandoned, then was restored, etc.

⁵ The reproductions of these texts have been published here and there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most recent and more complete ones were reproduced by the Xinwen feng 新文豐 publication company in Taipei : *Shike shiliao xinbian* 石刻史料新編 [New Edition of Stone Engraved Historical Materials], 1977 (2nd edition of this first series, *Chuji* 初輯, 1982), *Dierji* 第二輯 [Second series], 1979 and *Disanji* 第三輯 [Third series], 1986. Cf.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Annotated Bibliography to Shike shiliao xinbian* [New Ed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arved on Stone], Heidelberg, 1991.

scriptures engraved on them. I shall end with discussing the use of the word *chuang* 幢, “banner” for these stone pillars and the way understood Dunhuang artists understood it in the 8th -10th c.

Inscriptions: *sūtra*, *dhāraṇī*, “Invitation verses” and colophons

Nevertheless we may assume that c. 90% of the pillars are engraved with the *Buddho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sūtra* /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jing*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or only with its *dhāraṇī* without the narrative part of text. Usually, from the end of 7th to the beginning of 8th century, the entire *sūtra* is engraved, sometimes with an other *sūtra*, very often a short text, like the *Prāññāpāramitāhṛdaya* / the *Heart sūtra* as in Hebei 河北 Huolu Benyuansi 獲鹿本願寺, on a pillar dated in the year 702 (Wu Zetian Chang’an 2), or the *Lumen tuoluoni jing* 六門陀羅尼經, “Dhāraṇī of Six Gates”, translated by Xuanzang 玄奘, as in Longxian of Shaanxi on a pillar dated 728, now kept at Longxian museum (陝西隴縣博物館) [Photo 5 and 6]. There is a short colophon. Later in the 8th century, the *Buddho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sūtra* is often found engraved with a preface written by Zhijing 志靜. Some time after the mid-8th century the *dhāraṇī* is found engraved without preface nor the narrative part of *sūtra*. But often a dedication, much longer than the earlier ones, gives the date and the donors’ names with their social rank or their acting part in the enterprise of erecting the pillar, when it is the collective work of the local religious association. The *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 is found also engraved with other *dhāraṇī*, like *Wugou jingguang tuoluoni* 無垢淨光陀羅尼 / *Raśmivimalaviśuddhaprabhā-dhāraṇī* (T. 1024), “*dhāraṇī* of pure light”, or *Qianshou qianyan dabeizhou* 千手千眼大悲咒, “spell of the great compassion of thousand-arms and thousand-eyes Guanyi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9th century, pillars engraved with the *dhāraṇī* and short incantations or *mantra* were used as funeral monuments. About 50 years later, other long *dhāraṇī*, like that of Avalokiteśvara or the *Sitātapatra-dhāraṇī* (*Baisangai tuoluoni* 白傘蓋) were also engraved along with short magical spells like the *po diyu zhenyan* 破地獄真言, « spell to break the hell », *kaihou zhenyan* 開喉真言, “spell to open the throat [of the hunger ghost]”, *jiyuanjie zhenyan* 解冤結真言, “spell to dissolve the hatred” and *miezui zhenyan* 滅罪真言, “magical spell to release the sin”, etc.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9th century, syllabic strophes were added to the *dhāraṇī*. They praised its great magical efficacy and that of the *dhāraṇī* pillars. Scholars were often invited to write stanzas for it. For instance the text written by Li Po 李白 (701-762), studied by Paul Kroll and published not long ago by the Italian 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Kyoto. In year 869, the *dhāraṇī sūtra* got a new name, *Jiaju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jing* 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dhāraṇī sūtra* with extra-verses”⁶. In 971 a new set of syllabic strophes was added above this so-called *Jiaju lingyan tuoluoni* 加句靈驗陀羅尼 “Miraculous one with Extra-Verses” [Photo 7 and 8 for an example of pillar made in 1025].

You may ask what is this *Buddho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sūtra* and why it becomes so popular and engraved on pillars in so many places?

Chinese translations (see also Appendix)

The *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sūtra*, called *Sarvadurgatipariśodhan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 at the end of a unique Gilgit Sanskrit manuscript, was brought to the Tang capital, Chang’an, before 680. Within six years (679 – 685), four Chinese translations were made at Chang’an (T. 967, 968, 969, 970). On 710 Yijing 義淨 translated it anew (T. 971). Since the first half of 8th century, two ritual manuals by Indian tantric masters, Shanwuwei 善無畏 / Śubhakarasiṃha (T. 973) and Bukong 不空 / Amoghavajra (T. 972), were available for Chinese initiates. In 767 Amoghavajra asked the Emperor to establish a body of 14 monks and make them recite permanently the *Buddho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 in the Abhiṣeka hall of an imperial Temple at Taiyuan where the first Tang emperor had started the career which eventually gave him the throne. In 775, Bukong’s disciples asked the imperial court to order monks and nuns in the whole Empire to memorize and recite this *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 21 times a day. Each monastery should on every new year’s day tell the court the number of recitations made.

Sūtra translations and legend

Although five translations of this *dhāraṇīsūtra* were available, one only became popular in China and spread out all over Eastern Asia. It is the translation linked with the legend of the meeting of the Kashmiri monk Buddhapālita with Bodhisattva Mañjuśrī in Wutaishan.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narrated in the preface, Buddhapālita came first in 676 to Wutaishan to meet Mañjuśrī. There an old man, apparent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Bodhisattva, advised him to go back to India and bring back the

⁶ It is found at Zhejiang Yinxian Ayuwangsi 鄞縣阿育王寺. According to HUNG Yixuan 洪頤煊 (*Pingjin dubeiji* 平津讀碑記, III, suite *juan xia* (三續卷下), p. 18). The colophon gives the miraculous stories of Zhang Yi 張繹 and Ma Yang 馬揚 which were happen respectively in 710 and 821. This account is found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T. 974C, XIX 386c29-387b8, which is edited in Japan.

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sūtra to China so that people there could be spared the retribution of their sins. Buddhapālita obeyed this injunction, returned to India and came back with the Sanskrit sūtra. He presented it to the Imperial court in Chang'an in 683 AD [but in that year Emperor was at Luoyang, not Chang'an]. After having the sūtra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the imperial official translator, the Indian monk Divākara, the Emperor kept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in his palace for cultic use. Finally Buddhapālita was given back his Sanskrit manuscript. He translated it anew in Chinese with the help of a Chinese monk, then disappeared to Wutaishan with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The preface the contents of which I just summarized was written some time after 689 by a monk called Zhijing 志靜, otherwise unknown. The encouraging story of an Indian monk coming to China to meet an Indian bodhisattva, and suggesting that China was a very pure Buddhist land where the great Bodhisattva Mañjuśrī resided, became in a few years very popular with Chinese Buddhists. The unique Chinese female ruler, Wu Zetian 武則天 (r. 684-704), who pretended in 695 to be an universal Buddhist ruler, Cakravartin, used it for her political aims. The Indian monk Buddhapālita, who shared the same name as another Buddhapālita (ca. 470-540), author of a famed commentary on Nāgārjuna's *Madhyamakakārikā*, is also credited with the transmission of a meditation manual, the *Xiuchan yaojue* 修禪要訣, in 677. A 10th century legend adds that he is staying in the Vajra grotto (Jin'gang-ku 金剛窟) at Wutaishan together with Mañjuśrī and a hundred thousand other bodhisattva after disappearing with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sūtra*.

This version of the *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sūtra* translated, so they say, by Buddhapālita some time after 683 was engraved in a Longmen grotto in 692, without its preface. The first engraved pillar today known dates back to 697, still during Wu Zetian's era, also without preface. The first inscription with Zhijing's preface was made in 731, almost three decades after Wu Zetian's death. It seems that she didn't live long enough to benefit of the hidden political setting of this legend, if this was her intention.

Dhāraṇī-pillars / *tuoluoni-chuang*

According to the sūtra the *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 was initially taught by Śākyamuni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evaputra* Shanzhu 善住 / Supraṭiṣṭhita to suffer through

seven worst destinies and end up in the hell. At that time the Buddha described the immense power of the correct worship of the *dhāraṇī*, such as reciting it, coping it and putting it in conspicuous spots, on the tip of a “high banner” (*gaochuang* 高幢) or on the top of a “high pavilion” (*gaolou* 高樓) or on the summit of a “high mountain” (*gaoshan* 高山), depositing it in a stūpa at a cross-roads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passersby. Here I should quote the translation of G. Schopen, from his still unpublished work on the uniqu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is *dhāraṇī sūtra*. The translation was made from the Tibetan version for this passage is not found i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

“when this *dhāraṇī* has been written down it should be put on the tip of a banner pole, it should be put on the top of a high mountain or a high house or in a *stūpa*. If some monk or nun or lay brother or sister, or some other son or daughter of good family, were to see the tip of that banner pole or remain near it, or even if they were touched by its shadow, or touched by its dust when it is blown by the wind, for them no evil and no fear of going to an unfortunate state of rebirth arises. They would not be born in any of the hells, any bad rebirth, hungry ghosts, asuras, etc. These persons have been predicted by all Tathāgatas and do not turn away from an excelled, complete and perfect awakening” ⁷.

[Chinese text : 佛告天帝。若人能書写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乃至安置窰堵波中。天帝若有苾芻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族姓男族姓女。於幢等上或見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羅尼上幢等上塵落在身上。天帝彼諸衆生所有罪業。應墮惡道地獄畜生閻羅王界餓鬼界阿修羅身惡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為罪垢染汚。天帝此等衆生。為一切諸佛之所授記。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T. 967 XIX : 351b9-18)]

This passage gives the clue of the meaning of the odd Chinese expressions *jingchuang* “sutra banner”, “*tuoluoni chuang*”, “*dhāraṇī* banner “, or *shichuang* “stone banner” and its practice by some Chinese scholars.

⁷ This passage is not found i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but, according to G. Schopen, exists in the Tibetan version. The next passage prescribes the adoration of this *dhāraṇī* with flowers, incense, perfumes, garlands, umbrellas, banners, flags, and ornaments, and the making a caitya at a crossroads and depositing this *dhāraṇī* there, etc. Here the words for umbrellas, banners and flags are *cchatra-dhvaja-patākā* (Schopen p. 20). The Chinese version has *chuang fan gai* 幢幡蓋 (T. 967 351b19-20 ; T. 968 354b10 ; T. 969 356c5). The second translation of Divākara (T. 970) and Yijing’s translation (T. 971) show important variants.

The words *chuang*, “banner” and *shichuang*, “stone banner”, are actually used in the inscription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for instance on the pillar still to be seen in Huolu Benyuansi 獲鹿本願寺 in actual Zhengding xian 正定縣 of Hebei 河北, which bears a date of 702. This pillar is engraved both with the *Heart Sutra* and Buddhapālita’s translation. But I would like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so-called *zaoxiang bei* 造像碑, « stele engraved with [Buddhist or Taoist] images » made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Two of them use the word *chuang*. The first one is a Buddhist stele kept in Museum of Fine Arts at Boston. It bears a date of 529. At least three donors,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yi* 邑), have titles like *caixiangchuangzhu* 採像幢主 (Stela **Photo 9**). The second stele is a Buddho-Taoist stele (*Fodao zaoxiang bei* 佛道造像碑) made by a lay person called Li Tanxin 李曇信 and his relatives in 562. It was discovered in 1934 near Yaoxian 耀縣, about 150 to 200 (?) km north of Xi’an in Shaanxi. One of inscription of the front can be read : *xiong chuangzhu* 兄 幢主, « principal donor of the banner, the elder brother » (?) Now, in both inscriptions, I cannot be sure of the real meaning of *chuang*. It may refer to the stele itself, and if so, the « dhāraṇī pillars » erected more than 100 years later took over this name, in the same way as some designations of members of religious associations are common both to stela and *dhāraṇī* pillars.

Dunhuang illustration (*jingbian* 經變)

As I said in the beginning that about 220 *dhāraṇī*-pillars (697 to 1285) I have recorded are found mostly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But none is closer to Dunhuang region than the pillar erected in 939 AD at Tianshui 天水, in Eastern Gansu, about 800 kilometers as the crow flies from Dunhuang. None is known from Dunhuang proper. Dunhuang pillars may have been destroyed, but we should have expected to see them depicted in cave-paintings.

Buddhapālita’s version is found copied more than 100 time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story of the meeting of Buddhapālita with Mañjuśrī at Wutaishan is depicted in Dunhuang caves where one can also see illustrations of the *U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sūtra* (caves 103 and 217, both dated from the Tianbao era (742-755)). Besides, three panels, in caves 23, 55 and 454, represent this same *sūtra*. Cave 23 was dug out about at the same time as caves 103 and 217. Cave 55 was donated by Cao Yuanzhong 曹元忠 in 962 and cave 454 was excavated at the expenses of his two sons between 976 and 980. The panels in caves 55 and 454 are labelled :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bian*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 [**Photo 10**]. The

panels in caves 23, 103 and 217 were till not long ago identified as illustrations of the *Lotus Sūtra* or *Fahvajingbian* 法華經變. The right identification was given first by Dr. Shinomo Akiko 下野玲子 from Tokyo (cave 217), then by Dr. Wang Huimin 王惠民 from Dunhuang (caves 23 and 103).

No Dunhuang manuscript of the *dhāraṇīsūtra* bears a date. Pelliot 2411 uses Wu Zetian's characters, specially the graphic form for the character *yue* 月, "moon" in use from 689 to 698, and can thus have been written between 689 and 698, unless it is a later copy of an earlier one written between 689 and 698. In any case, a copy of this *sūtra* was made 15 years only after its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The copy was not necessarily made at Dunhuang, but, even if it was made at Chang'an or Luoyang or elsewher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uddhapālita's story and this *dhāraṇī-sūtra* were largely known in Dunhua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8th century.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the *gaochuang* on which one should install a copy of the *dhāraṇī* is depicted as a three-tier umbrella as we can still see in caves 23 and 454. I feel sure that a good number of *dhāraṇī*-pillars were standing in Wutaishan temples. Still extant are the two pillars at Foguang-si 佛光寺 erected on 857 and 877, the one at Zunsheng-si 尊勝寺 erected in 1009 [Photo 3 and 4]. Yet the Dunhuang artists do not seem not to have been aware of the existence of *dhāraṇī*-pillars, may be because they were cut from mainland China from 781 to 848 by the Tibetan military occupation. But, even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Tibetans, no *dhāraṇī*-pillar, so it seems, was set up.

Temporay Conclusion

While we are still posing the original use of *chuang*, "banner", as a stone pillar, it's certain that Dunhuang has developed cults of its own as the manuscripts and caves attest. Dunhuang Buddhists have thus developed a *Buddho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 cult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practices now attested all over the Asia. Indeed, a few 10th century "miraculous long *vijayadhāraṇī*" pillars are still standing in Vietnam and the rite called *sec-ktī jīv-dān* « give of life »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Devaputra Supatiṭṭhita was practiced till very recently in Thailand and Cambodia.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9th century, most of the *vijayadhāraṇī*-pillars were engraved with the new and longer miraculous *dhāraṇī*. The three *vijayadhāraṇī*-pillars still standing at Wutaishan exhibit only the version with the Buddhapālita's translation and Zhijing's preface, without any extra-verse. Two of them can still be seen in the

Foguang temple 佛光寺 at Wutaishan. They were erected in 857 and 877. The third pillar stands in a courtyard of the Zunsheng temple 尊勝寺, at Wutaishan also, and bears two dates, viz. 1009 and 1026. The Zunsheng temple was built at the very place where Buddhapālita is supposed to have met Mañjuśrī. There is nothing but normal to have his translation engraved on a pillar erected at this place, even if, at that time (late 9th century), this version of the *dhāraṇī* was no more in fashion in the other Chinese provinces. Indeed, on some pillars, this earlier version of the *dhāraṇī*, engraved together with Buddhapālita's translation and Zhijing's preface, was erased and replaced by the New Miraculous *dhāraṇī* with Extra verses. But, surprisingly, at Wutaishan no pillar, to my knowledge, is engraved with a copy of the "Miraculous *dhāraṇī* with extra verses" or with the "Invitation to the miraculous *dhāraṇī* with extra verses" although these longer and new *dhāraṇī* are also said to have been transmitted at Wutaishan.

Today, the *Buddhoṣṇīṣavijaya-dhāraṇī* cult is still practiced at Wutaishan although not in a very impressive way. In the Xiantongsi 顯通寺, Wutaishan's biggest temple, two long cloth banners inscribed with the Vijayadhāraṇī are hanging from the ceiling in the Hall of Mañjuśrī with Thousand Bowls. They were presented in 1999 by an Association of Buddhists from Hong Kong. Both banners exhibit the text of the *dhāraṇī*. At the end of the text, the name of a Bodhisattva-Mahasattva called Zunshengchuang pusamohesa (尊勝幢菩薩摩訶薩), « Vijaya-Banner Bodhisattva-Mahasattva » is inscribed. This is a contemporary instance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is *dhāraṇī* cult: even the banner, now, has become a divinity.

Appendix :

List of texts related to the *Buddhoṣṇīṣavijayādhāraṇī-sūtra*

Sanskrit Manuscripts :

1. *Buddhoṣṇīṣavijayādhāraṇī* in proto-śāradā style (c. 630-720), Hōryūji, Nara, Japon. Written after the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Heart Sutra* / [Panruopoluom] *Duoxinjing* [般若波羅密] 多心經)
2. *Sarvagatipariśodhanoṣṇīṣa-vijayā-dhāraṇī* (Title at the end)
Gilgit Manuscript of the *sūtra*, 7 folios a et b. Incomplete.
Studied by G. Schopen [beginning of 7th c.].

In the *Taishō Canon* :

A. *Sūtra* (with the story of *devaputra* Shanzhu 善住 / Supraṭiṣṭhita) :

- 1) T. 967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one *juan* + Preface [of Zhijing 志靜] written after 689. Said to have been translated by a Kashmiri monk called Fotuopoli 佛陀波利 (Buddhapālita) after 683, with the help of a Chinese monk called Shunzhen 順貞.
- 2) T. 968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one *juan*. Translated by Du Xingyi 杜行顗 in 679.
- 3) T. 969 *Foding zuisheng tuoluoni jing*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 one *juan* + Preface of Yancong 彦悰, dated in 682. Translated by Dipoheluo 地婆訶羅 (Divākara) in 682.
- 4) T. 970 *Zuisheng foding tuoluoni jingchu yezhang zhou jing* 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 one *juan*. Translated by Dipoheluo 地婆訶羅 (Divākara) [his second translation] in 685 (according to Huilin 慧琳 on a work of 802, *Yiqiejing yinyi* 一切經音義, T. 2128(36) LIV : 544a).
- 5) T. 971 *Foshuo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 佛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one *juan*. Translated by Yijing 義淨 in 710.

B. *Yigui* 儀軌 / Manuals :

- 6) T. 972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niansong yigui fa* 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 one *juan*. Bukong 不空 / Amoghavajra in 764 (according to Huilin 慧琳).
- 7) T. 973 *Zunsheng foding xiu yuqie fa guiyi* 尊勝佛頂修瑜伽法軌儀, two *juan*. Shanwuwei 善無畏 / Śubhakarasiṃha or his disciple Xiwuwei 喜無畏 [composed] in 722 (according to Huilin).
- 8) T. 974F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biefa* 佛頂尊勝陀羅尼別法, one *juan*. Ruona 若那 (9th c.).
- 9) T. 974E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zhenyan* 佛頂尊勝陀羅尼真言. After a manuscript of Heian period (781-1183), kept in Tōji (Kyōto).

C. *Miraculous Tales* :

- 10) T. 974C *Jiaju lingyan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 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記 [« *Records of Miraculous Tales* on reciting the long version of the

Uṣṇīṣavijayādhāraṇī »], one *juan*. [First part] attributed to Wu Che 武徹 [8th c.]
[The last story bears a date in the year of 823]

D. [Second] *sūtra* :

11) *T. 978 Foshuo yiqie rulai wusenisha zuisheng zongchi jing* 佛說一切如來
烏瑟膩紗最勝總持經 ([*Sarvatathāgata*]-*uṣṇīṣa-vijayādhāraṇī*), one *juan*.

Translated by Fatian 法天 [Dharmadeva] in 994.

[Narrative part is much shorter than the former one and without any story of
devaputra; the *Uṣṇīṣavijayādhāraṇī* is pronounced by the Amitāyus at the
request of Avalokiteśvara]

11bis) Manuscript [from Nepal] in Sanskrit of 18th or 19th century [Paris :
Library of the Société Asiatique]

List of photos:

1. One of the earliest *dhāraṇī* pillars, still standing at Yuanqi si 原起寺 near Lucheng in
Southern Shanxi (山西潞城市), erected –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 – in 744 AD (Tang
Tianbao 天寶 3). Photo Kuo Liying, September 2002.

2. Two *dhāraṇī* pillars standing in Wutaishan 五台山, at Foguangsi 佛光寺 (on the left
for the viewer) and Siyang ling 思陽嶺 (on the right), from a photograph taken in
October 1925 and published by TOKIWA Daijō 常盤大定 and SEKINO Tadashi 關野貞
(ed.), *Chūgoku bunka shiseki* 中國文化史蹟, vol. I, pl. 107 (1975 edition), Kyōto,
Hōzōkan 法藏館.

3. The Wutaishan *dhāraṇī* pillar at Foguangsi (see ill. n° 2, pillar on the left for the
viewer), erected according to its inscription in 877 AD (Qianfu 乾符 4 of Tang). Photo
Kuo Liying, September 2002.

4. The Wutaishan *dhāraṇī* pillar at Siyang ling, now called Zunsheng si 尊勝寺 (see ill.
n° 2 on the right for the viewer). Erected in 1009 AD (Song Dazhongxiangfu 大中祥符
2) and repaired in 1026 (Song Tiansheng 天聖 4) according to its inscription. Photo
Kuo Liying, September 2002.

5. Stone pillar dated in 728, now kept in the Longxian museum, in Shaanxi (陝西隴縣博
物館), engraved with two *sūtras* (*Foshuo liumen tuoluoni jing* 佛說六門陀羅尼經 and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 佛頂尊勝陀羅尼). Upper part of a rubbing made in 2002. Photo KUO Liying.

6. Lower half of the same 728 inscription, showing part of the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shichuang* 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 Lower half of a rubbing made in 2002. Photo KUO Liying.

7. Stone pillar erected in 1025, still standing near by Quanzhou. Photo KUO Liying, December 1997.

8. Detail of the same 1025 pillar, showing the “invitation verses”. Photo KUO Liying, December 1997.

9. Detail (left side) of a Buddhist stela, dated 529, kept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at Boston. One can read : *caixiangchuangzhu* . . . 採像幢主 . . . Photo by Stanley ABE, 2006.

10. Detail of a Dunhuang painting in cave 55. The title *Foding zunsheng tuoluoni jingbian*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 is written in the cartouche. Photo WANG Huimin, Dunhuang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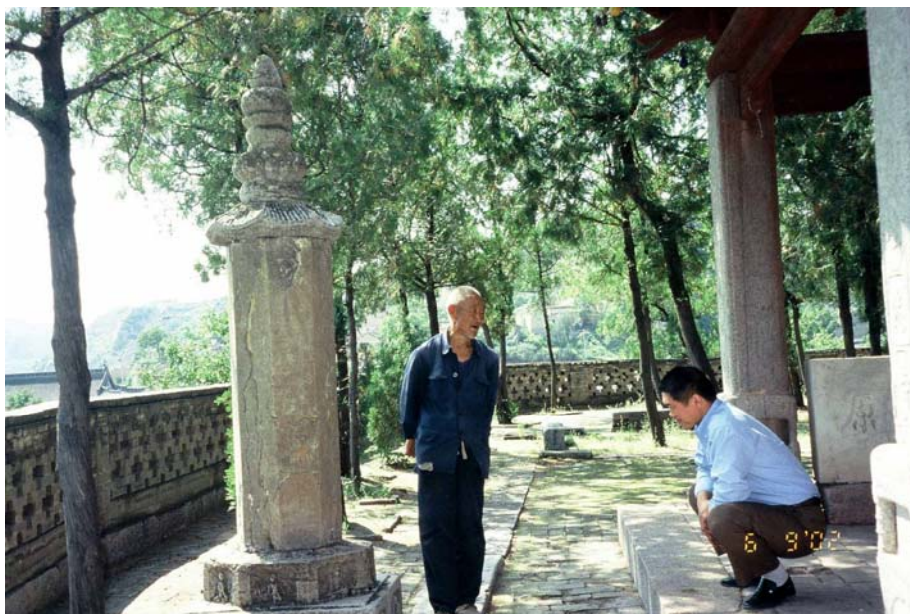


Photo 1



Photo 2



Photo 3



Photo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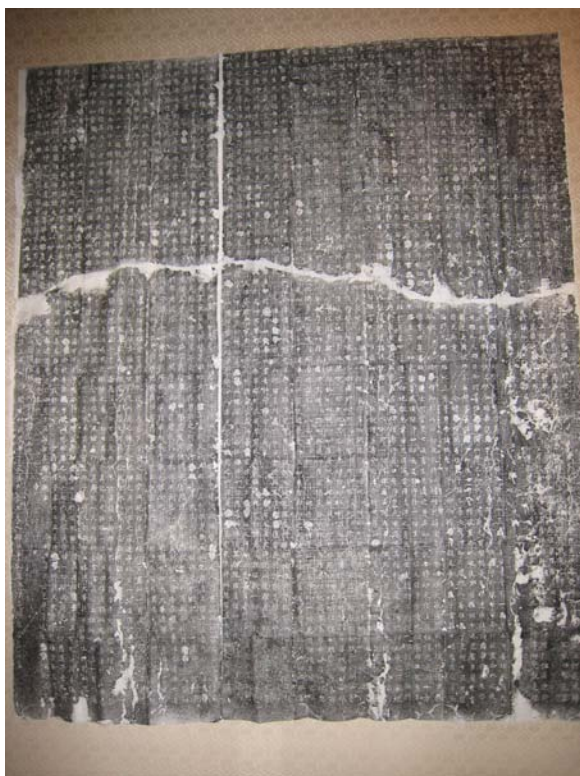


Photo 5



Photo 6



Photo 7



Photo 8



Photo 9



Photo 10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資料について

井 波 陵 一

(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

■ はじめに

本日のテーマは私にとってはまことに荷が重いものであり、正確に申し上げれば、「よくは分から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石刻資料について」ということになろうかと思えます。

研究所の學問の特徴は、たとえば「文獻實證主義」という言葉で表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そうですが、研究所の様々な歴史やエピソードについては、肝腎の文獻が容易に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それはむしろ言い伝え、語り傳えの世界に屬すると言った方が適切ではないかと思えます。年配の所員が若い者をつかまえて、「〇〇くん、こんなこと知ってるか?」、「いえ、知りません」、「そうか、では教えてあげよう」という形で伝えられていくものであります。そうなりますと、話し好きと聞き上手という強力なコンビ、パスの出し手と受け手のホットラインが成立すれば問題ないのですが、現實には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きません。少なくとも私は落第であります。さらには、「〇〇くん、こんなこと知ってるか?」、「ええ、誰々先生に伺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そんなんアカン、あいつのは又聞きのガセネタや、ほんまはこうやで」、「はあ?」といったケースも出て来るわけで、こうなるとますます厄介です。

というわけで、本日は傳聞、仄聞に頼らず、私が実際に目にした資料に基づきながらお話し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したがって、はなはだ面白味に缺けるかも知れませんが、その點、あらかじめお許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 石刻カード

所藏資料の全體像を窺おうとすれば、まずカードを参照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そのカードは合計9つのカードボックスに収められており、ラベルには4種類ありました。東方文化時代のものが1種類、人文研になってからのものが3種類です。

1. 東方文化時期

①「石刻資料」

(1) 石刻資料

36 函に分かれる。「磁縣石刻・鞏縣畫像」(第3函)、「開封購入」(第4函)、「山東畫像」(第10函)、「金石萃編所錄北齊石柱」(第15函)、「安陽購入」(第22函)などと、題簽に内容を記した函もある。

(2) 石刻資料第□輯

2. 人文科學時期

②「新收石刻資料」 ③「内藤氏舊藏拓本」 ④「匋齋藏石記」

①「石刻資料」

石刻資料(001～694)	
*012～034のみ封筒使用、001～011(画像石)はXXIIIへ	
北平白雲觀石刻	I * Iのみ封筒使用
河南登封縣嵩山石刻	II
北平法源寺	III
房山石刻	IV
河南圖書館藏拓本	V
河北第一博物館	VI
河洛圖書館	VII
古刻萃珍	VIII
寶山石刻	IX
北響堂山	X
河南洛陽龍門	XI
雲岡石刻	XII
山東省掖縣雲峰山	XIII
陶齋藏甄拓本	XIV
北京近郊	XV
金石萃編所收石刻拓本	XVI
滿洲國奉天博物館藏石	XVII
孔林宋元明碑	XVIII
芮城縣魏周隋唐造像	XIX
河南鞏縣石窟寺畫像	XX
山東長清縣靈巖寺	XXI
曲阜・濟寧・兗州・鄒縣	XXIa
漢瓦石	XXII
漢畫像石	XXIII
鹽池廟拓本	XXIV
松本文庫	
粵西碑文拓本	
醫巫閭山碑	

012～034

012	西晉宜成宣君郭夫人之柩銘	北平國立圖書館
013	魏長樂馮邕之妻元氏墓誌銘	Fine Art Museum of Boston
014	北魏徐州刺史元悅墓誌	北平貴志彌三郎氏
015	隋李元及夫人鄧氏合葬墓誌	北平貴志彌三郎氏
016	隋杜夫人鄭氏墓誌	北平貴志彌三郎氏
017	隋蕭球墓誌	北平貴志彌三郎氏
018	唐仵欽墓誌銘	北平西城中國大學藏

019	宋温仁朗墓誌	***
020	東魏報德寺七佛頌碑	大阪小澤龜三郎氏藏
021	北魏陳天寶造塔造像記	***
022	北魏龐定國等造像記	大阪山中商會所見
023	畫像墓磚	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藏
024	元上百戸張君墓碑	旅順旅順博物館藏
025	魏毌丘儉紀功碑	奉天國立圖書館
026	唐行司農寺丞姚元景造像記	東京細川護立侯爵藏
027	唐寶積寺馮鳳翼等造像題名	東京細川護立侯爵藏
028	大唐李承嗣造阿彌陀佛記	東京細川護立侯爵藏
029	唐虢國公花臺造像記	東京細川護立侯爵藏
030	唐高延貴造阿彌陀像記	東京細川護立侯爵藏
031	唐富平縣丞韋均造像記	東京細川護立侯爵藏
032	唐楊子縣令蕭元慎造彌勒像記	東京細川護立侯爵藏
033	唐翻經僧德感造觀音像記	東京細川護立侯爵藏
034	龍門琵琶樂天	***

②「新收石刻資料」

桑原氏拓本
歴代金石拓本
北京大學研究所所藏金石拓本
駝山
軸装・帖装
中國金石拓本

③「内藤氏舊藏拓本」

内藤氏舊藏拓本(第1函～第34函)
内藤氏舊藏拓本別函・軸装
匋齋藏石記(卷1～15) * 卷1～19は内藤第35函

④「匋齋藏石記」

匋齋藏石記(卷16～44) * 卷20～34は内藤第36函、卷35～44は第37函
匋齋藏石記未著録 墓誌銘・造像銘・佛經・雜石・甄
早崎氏舊藏拓本

■ 東方文化時代

東方文化のものから見ていきますと、ラベル名は「石刻資料」で、中身はさらに「石刻資料」と「石刻資料第□輯」の2種類に区分されます。「石刻資料」の方は実際の帙の數で言いますと、全部で36函に分かれており、たとえば、第3函には「磁縣石刻・鞏縣

画像」、第4函には「開封購入」、第10函には「山東画像」、第15函には「金石萃編所録北齊石柱」、第22函には「安陽購入」などと、題簽に内容を記した函もあります。①「石刻資料」という表の一番上の枠に、石刻資料(001～694)と記したものがそれに当たります。すなわち、ここに収められる資料は694点というわけです。ただ、001～011の画像石は分類替えを行ったので、現在では闕番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012から034までは専用の封筒に収められており、その一例が下の024「元上百戸張君墓碑」の封筒です。

名	元正八年
題	上百戸張君墓碑 2
質	
材	
大 小 (長)	
小 小 (短)	
銘	
時	
代	
所	旅順市 旅順博物館蔵
在	昭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島田夏彦氏寄贈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蔵

この「張君墓碑」はたしか NHK の番組で使われたも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右下に「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と印刷してあり、あらかじめ項目が指定してあります。並んだ項目から考えると、必ずしも石刻資料専用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ようです。石刻専用であれば、一番上の「番号」の所に最初から「石刻」の2文字を印刷しておいたことでしょう。いずれにせよ、1929年から1938年までの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時代に受入の態勢を整えようとし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す。ただ、封筒の恩恵に浴したのは034まででした。

同じことは、もう1種類の「石刻資料第□輯」についても当てはまります。こちらの方はローマ数字で24まであります。最初のたんなる「石刻資料」が頂戴したものという感じ

を与えるのに対し、こちらの方は、ある機関や地点といった、特定の目標を定めて収集しようとしたものという感じを与えます。ただ、こちらも第1輯についてのみ封筒が使用されています。その例が下の「白雲觀重脩記」で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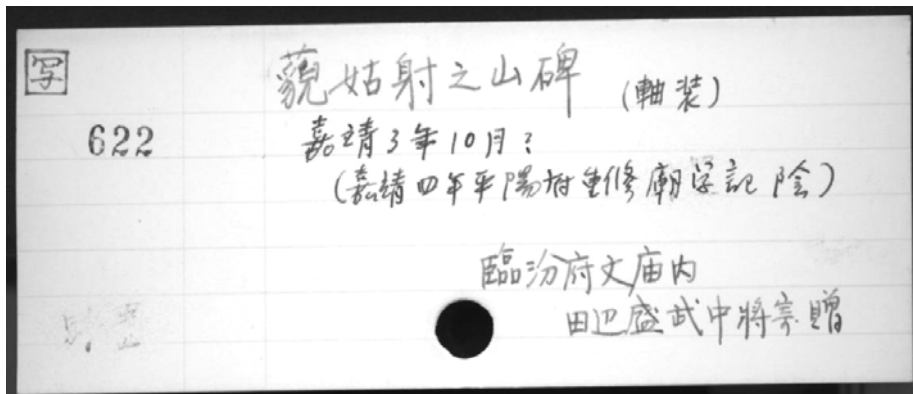
番 號	石刻 1001
名	白雲觀重脩記 (三統元龜)
題	
材	
大 冊 (冊)	
小 冊 (冊)	
著	
時	
代	
所	北平市 白雲觀 南渡前北壁 (小柳田氏蔵)
在	

「張君墓碑」と「白雲觀重脩記」の封筒を見比べると、筆跡は同じように思います。誰がこの整理を受け持っていたのでしょうか。封筒を使う整理作業は、どうして早々と挫折したのでしょうか。

石刻資料は寄贈・購入による収集が中心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が、実際に拓本を取りに出かけたこともあったようです。ここで1つだけ聞いたことは申し上げます。と言っても、「井波くん、こんなこと知ってるか？」ということで教えてもらった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もう34年近く前のことになりますが、1973年の春に人文研の退官記念講演が、東一条の昔の建物、舊ドイツ文化研究所と言いますか、西洋文化研究所と言いますか、とにかく村野藤吾氏が設計した建物、なんでも、今また全集が刊行され始めた立原道造も見學に訪れたそうですが、その建物で開かれました。講演者はお二人で、小野川秀美先生と平岡武夫先生です。學部1回生の春休み、たしか教養部のストライキがあつて、學年末試験が1か月ほど遅れて始ま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ますが、そんなわけでたまたま通りがかり、看板を見て中に入ったのでしょう。その時の平岡先生の話の中に、中國で拓本を取った際、原石に傷をつけるといけないので、靴を脱いで石の上に上がったと

ころ、一行を乗せて来た車夫から、よその國のものを鄭重に扱う人だと言われて、たいそう感心された、という思い出話がありました。たぶんもっとよくご存じの方は大勢いらっしゃるでしょう。

話を元に戻しますと、石刻資料の画像デジタル化を行うということで、ここ何年かカードを順次めくる仕事をやっており、この春には、誰もほとんど見ないような明代まで進みましたが、そこで興味深い1枚に出会いました。それが下の 622「藐姑射之山碑」(軸装)です。まず整理カードを御覧ください。



最後の1行に「田辺盛武中將寄贈」と記してあります。田辺盛武氏(1889.2.26～1949.7.11)は以下のような経歴の持ち主です。

1910.5 陸軍士官學校卒業
 1939.10 中將・第41師団長
 1941.3 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長
 1941.11 参謀次長兼兵站總監
 1943.4 第25軍司令官
 1949.7 メダンにて刑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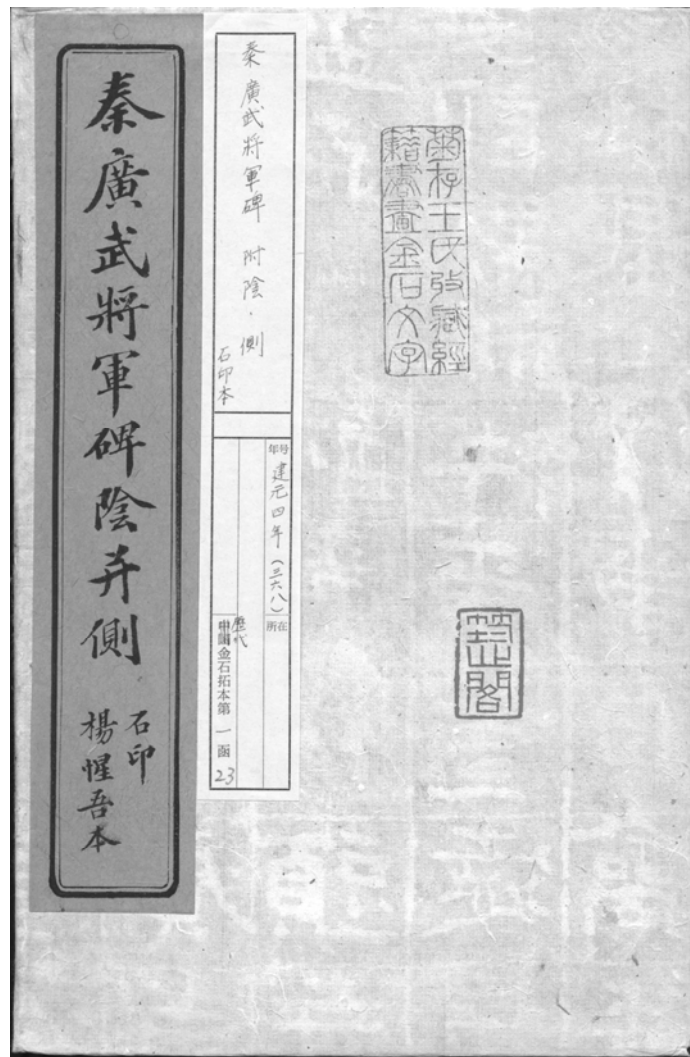


所在地の臨汾府が日本軍の手に落ちたのは、1938年の2月か3月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この「藐姑射之山碑」が田辺氏の寄贈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彼が1941年3月に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長に就任して以降のことでしょうか。正確なところは分かりません。それにしても、この「寄贈」はどういう意味を持つのでしょうか。田辺中將の寄贈というのはあくまで形式的なものなんでしょうか。そうだとすれば、実際にはどのような経緯が存在したのでしょうか。ざっと見ただけですが、軸そのものには寄贈されたことを示すものは無かったように思います。いずれにしても、資料収集が行われた当時の時代状況を物語る1点であると言えます。

■ 人文科学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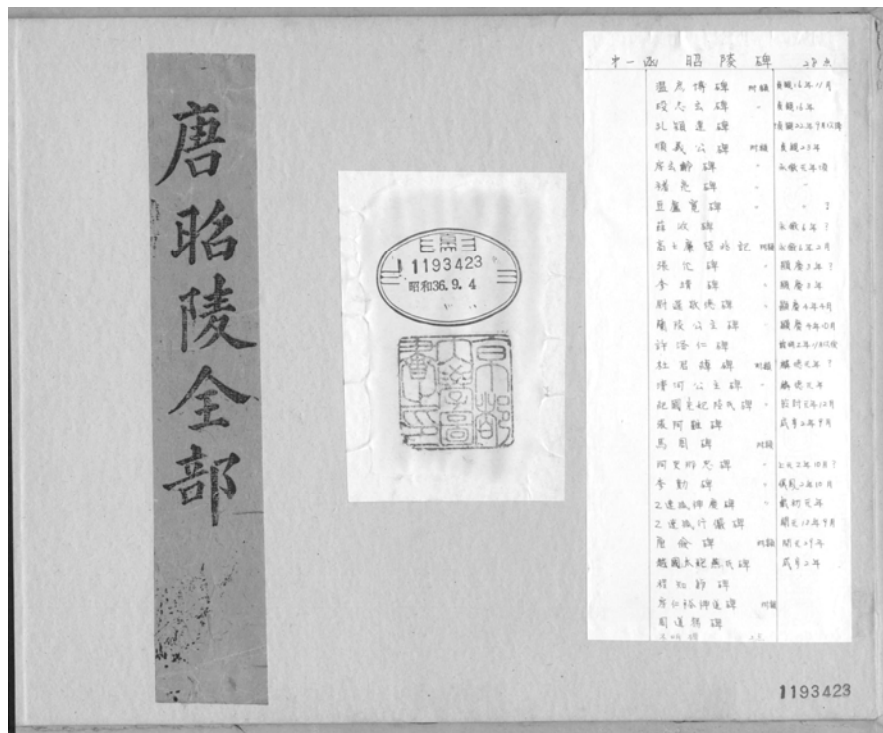
では續いて、人文研時代の資料に移ります。カードボックスのラベルは3種類、②「新收石刻資料」、③「内藤氏舊藏拓本」、④「甸齋藏石記」がそれに当たります。②「新收石刻資料」は桑原氏拓本、歴代金石拓本など6つに分かれています。

下の「秦廣武將軍碑」を御覧ください。物そのものは石印本です。「菊存王氏攷藏經籍書畫金石文字」という印が捺してありますが、どういう素性の人か分かりません。ともあれ整理用に添付された紙を御覧ください。これが戦後に作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中國」の「國」の字が當用漢字であることから窺われます。また「中國」の2文字を消して「歴代」に置き換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から、まずは②「新收石刻資料」の最後の枠にある「中國金石拓本」を整理するために作成され、それが「歴代金石拓本」を整理する際にも用いられ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す。後で觸れるように、この整理作業は日比野丈夫先生の共同研究班において行われました。



「桑原氏拓本」、すなわち桑原隲藏先生舊藏の拓本は、いつ研究所に入ったのでしょうか。最終的な登録が終了したのは、たとえば下に見えるように、1961年9月4日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これは「桑原氏拓本」の帙の内側をコピーしたものです。

桑原隲藏先生の蔵書を、先生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った後、桑原武夫先生がすべて寄贈された経緯はよく分かっているし、武夫先生が後年、『論語』の本を書かれる際に、便利で必要な本を探したら、それが文学部の桑原隲藏文庫にあった、などというエピソードも残っているのですが、拓本については何も聞き及んでおりませ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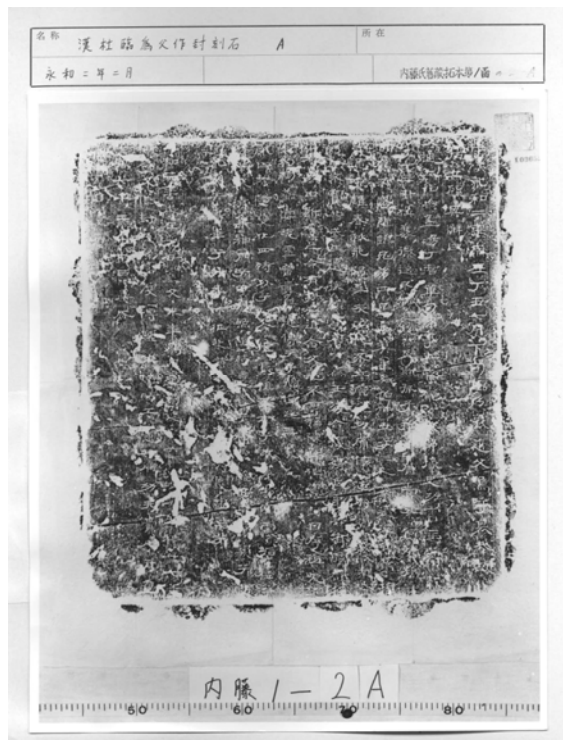


「内藤氏舊藏拓本」、すなわち内藤湖南先生舊藏の拓本についても同様のことが言えるかと思います。こちらについては、日比野丈夫先生が『内藤湖南全集』第 7 卷 (1970 年 2 月) の月報に「内藤先生の金石拓本」と題する一文を寄せておられます。その一部を引いておきます。

内藤先生が長年にわたって蒐集された金石の拓本を、京都大學の人文科學研究所におゆずりいただいてから、すでに十年以上にもなる。誰が責任をもって整理したということもなく、目録もできていないので、偶然のことからわたくしが主になって、一応の分類を了し主要なものを寫眞にとった。

1950 年代に受入が行われたのは分かりますが、その詳しい受入の経緯については、残念ながら何も觸れておられません。下の図の右上に見えるように、いちおう登録は終わ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これも余計なことですが、日比野先生の文章の中に、「誰が責任をもって整理したということもなく、目録もできていないので、偶然のことからわたくしが主になって」とあります。こういう文章を読むと、実際にはどうであったのかはともかく、そうした書き方に、「ああ、いかにも人文やなあ」と思ってしまいます。



漢籍の場合、東方文化時代に受け入れたものについては東方文化の蔵書印を捺してあるだけで、改めて京都大學の印は捺してありません。石刻資料の場合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なにしろ漢籍と違って、たった1枚開いて畳むだけでも神経がすり減るので、いちいち調べるには至っておりません。少なくとも京都大學の印は無い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さて、「内藤氏舊藏拓本」は④の「匋齋藏石記」をもその中に含み込むと考えた方がいいのでしょう。匋齋、すなわち端方の藏石とその拓本、それが「内藤氏舊藏拓本」の第35函から第37函までを構成し、さらに「匋齋藏石記未著録」のものまで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そのあたりをスッキリさせるためには、まず何よりも端方のことに詳しい所内の某先生に聞いてみるのが一番だと思ったのですが、某先生も「気にはなっているけれど……」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ので、私ごときが気にしても仕方のないことなのだ、と別の意味で気分がスッキリした次第です。ちなみに「内藤氏舊藏拓本」には第38函も存在し、畫像関係のものが収められているようです。

■ 共同研究

石刻資料に関する共同研究としては、何と言っても1968年から70年にかけて行われた日比野丈夫先生の「中國金石資料の研究」が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されました。さきほどの月報にもある通り、厩大な数の寫眞を撮影しています。先代の社長が特設スタジオを作って撮影したと、寫眞店の現社長も話しておられました。なにしろ軸装になった西晉初期の「辟雍碑」のように、高さが3メートルを越えるバカでかいものもありますから、大変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いずれにせよ、研究の基礎がしっかり固められたことは確かだと思います。

そうした基礎の上に本格的な研究成果を出されたのが、永田英正先生を班長とする研究班の報告、『漢代石刻集成』であります。これは所蔵資料の整理という枠を大きく越え、出土木簡なども視野に入れた漢代史研究全般の推進を目標としたものですが、報告集の序文で、永田先生は、

中でも特記すべきは日比野丈夫教授の貢献である。すなわち教授は、1968年4月から2年間、「中國金石資料の研究」を主宰して石刻拓本の整理と研究を行うとともに、拓本を寫眞撮影して拓本の寫眞カード化を精力的に推進されたのである。その結果、従来のように大型の拓本をいちいち廣げることなく全拓を見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り、釋讀の検討から資料の検索にいたるまで格段の便宜を蒙ることになった。

と述べておられます。なお、私が今回取り上げた9箱のほかに、すべての資料を合わせて年代順に並べ替えた7箱のカードもあり、デジタル化の際にはそちらを使用しました。

漢代が終われば次はおのずから魏晉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日比野先生の言い方を借りれば「偶然のことからわたくしが主になって」デジタル化の作業を始めたこと、永田班に参加された多くの方々が、富谷至さんの主宰する敦煌漢簡を読む研究班に参加しておられたこと、等の理由により、富谷さんと私が共同班長となって、ただし他のテーマも研究対象にしていたので、「三國時代の出土文字資料班」という名稱の研究班を組織し、その成果の一つとして『魏晉石刻資料選注』という報告を出版しま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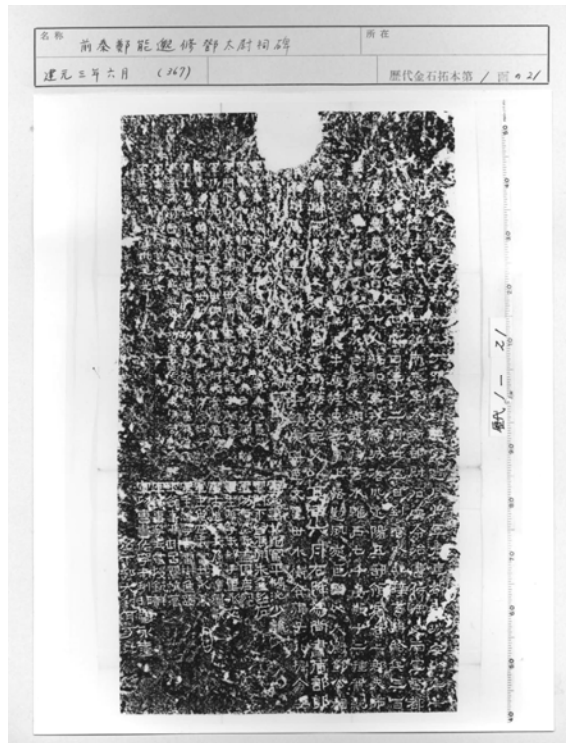
中國中世史の専門家でもないのに、井波はさらに悪ノリして、昨年度より「北朝石刻資料の研究」を組織している次第です。

■ 前秦鄭能邈修鄧太尉祠碑(367年)

というわけで、この研究班において最初に讀んだ「前秦鄭能邈修鄧太尉祠碑」について少し觸れ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隸書、19行、前8行行29字、後11行、書立石人名作三列。相傳有額、然審視較舊拓本穿上與其左右無字可見。在陝西蒲城(建元三年六月)。舊拓本字多清晰。間有漫漶亦可辨、近則漫漶殊甚。(『增補校碑隨筆』)

碑首尖首形、上有穿孔、高170釐米、寬64釐米、9行、行29字、字文現多漫漶不清、全文見『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碑文右刻將佐題名26人、爲我國書法名碑之一。碑原在蒲城縣東北70里鄧太尉祠、1972年入存西安碑林。現存西安碑林第三室。(『西安碑林書法藝術』)



大秦苻氏建元三年歲在丁卯馮翊護軍建威將軍奉車都尉城安縣侯華山鄭能進字弘道聖世鎮南參軍水衡都尉石安令治書侍御史南軍督都水使者被除爲護軍甘露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到官以北接玄朔給兵三百人軍而吏屬一百五十人統和寧戎鄜城洛川定陽五部領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白虜支胡粟特苦水雜戶七千夷類十二種兼統夏陽治在職六載邈無異才履性忠孝事上恪勤夙夜匪懈以太尉鄧公祠張馮翊所造歲久頽朽因舊脩飭故記之以其年六月左降爲尚書庫部郎護軍司馬奉車都尉關內侯始平解虔字臣文聖世水衡令蒲子北掘令安邊將軍司馬都水參軍被除爲司馬

(上截)

軍參事北地靈武孟□完廣
軍參事和戎鉗耳□□龍
軍門下督和戎鉗耳□世虎
軍功曹和戎鉗耳□當世興
軍主簿河西臨晉楊萬世和
軍主簿和戎雷夫龍道藏
軍主簿河西重泉范高延思
軍主簿和戎雷道子安
軍主簿和戎雷川玉光

(下截)

軍主簿和戎雷永景文
軍主簿和戎西羌騎世龍
軍錄事和戎雷顏道□
軍錄事和戎甞陸道□
軍錄事和戎儁蒙琕子諒
功曹書佐和戎雷陵道進
功曹書佐和戎儁蒙龍彥詳
軍參事北地富平楊洸少論
軍門下督馮翊朱進超石
軍功曹寧戎蓋周彥容
軍主簿寧戎郝子星永文
軍主簿寧戎屈□童道詵
軍主簿寧戎甞共永萇
軍主簿寧戎雷樹進夔
軍錄事馮翊呂騫□薊
軍錄事寧戎甞投欽詳
軍功曹書佐寧戎利非閻永遠
治下部大鉗耳丁比

この碑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ものですから、特に目新しいことは申し上げられないので

すが、皆さんのおさらいを兼ねる形で、2つの點に絞って話を進めて見ましょう。まず第一は、文中に出て来る少数民族の名稱に「粟特」が登場することです。粟特、すなわちソグドに関する研究は新発見などもあって近年非常に盛んであり、私などが口を差し挟む餘地はまるでありません。ただ、この碑文の「粟特」が面白いのは、それが西方の「國」ではなく、中國内地に居住する「種族」を粟特と稱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ります。こういった例は他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せん。魏晉南北朝の正史を検索しても、出て来る粟特はすべて西方の國を指しています。この碑文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としては、馬長壽さんの『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という著作があります。碑文で少数民族が列擧される箇所、「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涼西羌盧水白虜支胡粟特苦水」について、馬長壽さんはおおよそ次のように考えておられます。

(地名)	(族名)
	屠各
上郡夫施	黑・白羌
高涼	西羌
	盧水(胡)
	白虜
	支胡
	粟特
	苦水(人)

最後の「苦水」は「盧水(胡)」ほどには熟していないけれども、それと同じタイプの呼び方であるようです。

■ 粟特

それはともかく、「粟特」ですが、まず文獻資料で注意すべきは、馬長壽さんが指摘しておられるように、『晉書』の「石季龍載記」に「粟特康」という人名が見えることでしよう。これは「粟特康」の誤りで、「鄧太尉祠碑」に見える「西羌騎」のように種族名を姓としている例だと解釋されています。碑文の「粟特」とこの「粟特康」を結びつけて考えると、當時、粟特と呼ばれた人々が一定の勢力を持っていたらと推測されます。ちなみに、標點本の『晉書』は「粟特康」について何の注記もありませんから、冊子の人名索引やデータベースを検索しても「粟特康」は出て来ません。馬長壽さんの論考は、粟特人が康居人に支配されていたことから、「康」の字を姓とする人々の方に話が移っていくのですが、私が興味を持つのは「康」ではなく、この碑文で使われた「粟特」という呼稱が、中國内地の一種族を表す言葉としてそのまま長續きして用いられなかったという點であります。碑文で「粟特」と總稱された種族は、文獻の上で他に何か独自の呼稱を有するのでしょうか。あるいはいったん別の呼稱の中に包括さ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ちなみに Eric TROMBERT さんは「羯」に含まれているとお考えのようです。

人們猜測羯原爲伊朗人、實際上這種推測不可靠。但是在中國人歸結爲“羯”的含糊不清的不同成分中、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粟特人的可能性很大。(童丕〔Eric

TROMBERT)「中國北方的粟特遺存」『粟特人在中國』、「法國漢學」第10輯、214頁)

隋唐時期に華々しく活躍する「粟特」の人々と、この碑文にそれこそポツンと出て来る「粟特」の人々を繋ぐ適切な資料というものは存在するのでしょうか。

■ 鄧艾

續いてこの碑文の主役である鄧太尉、すなわち三國魏の鄧艾について觸れたいと思います。『水經注』をめくってみますと、鄧艾に関する記事が4つほど出て來ました。

① 同昌縣

『水經注疏』卷20(『水經注圖』南6西7丁3)

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東逕洛和城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東北流、逕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鄧至城南。

會貞按：《通鑑》魏嘉平元年、漢姜維引軍救麴城、不克而還。鄧艾屯白水北。胡《注》引此文云、即艾所屯地。以鄧艾至此、故以名城。據《通鑑》洮城在白水北、去艾屯六十里。洮城近洮水、則艾所屯、當是今祥楚河下流、清江之北。若此白水在洮城南數百里、艾尚不至此。又《元和志》鄧艾故城在曲水縣東七里。魏景元四年、鄧艾自陰平道伐蜀、蓋此時所築城也。考其城亦在此鄧至城之東百餘里。然《北史》云、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爲羌豪、因地名號曰鄧至。其地自街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隋志》、同昌縣有鄧至山、云、鄧艾所至、故名。《元和志》、鄧至山在同昌縣東二十五里、鄧至城在縣南三里。《方輿紀要》引《城邑考》、鄧至城以鄧至山而名、是蓋相傳鄧艾嘗至此、故有鄧至山之目、而羌因以鄧至爲號。……

『資治通鑑』135「齊紀」1：「〔建元三年、481〕五月、壬戌、鄧至王像舒遣使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於宕昌之南。

② 長安縣

『水經注疏』卷19(『水經注圖』南5西4丙6)

又東過長安縣北。渭水東分爲二水。……又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也。後人以爲鄧艾祠。

守敬按：《魏志・鄧艾傳》、段灼上疏曰、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此後人所由以陽侯祠爲鄧艾祠也。・『三國志』鄧艾傳によれば、段灼の上疏は泰始三年(267)、孫の鄧朗を郎中に取り立てる詔勅が下ったのは泰始九年(273)。

③ 雍縣

『水經注疏』卷18(『水經注圖』南5西5丙4)

渭水又東、雍水注之。……亂流南、逕岐州城東、而南合雍水、州居二水之中、南則兩川之交會也。世亦名之爲湊空水。東流、鄧公泉注之、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

會貞按：《方輿紀要》、鄧水出鳳翔府北二十里之黃花谷、下流合於橫水。蓋出後世傳會、非古鄧泉也。據《注》鄧艾祠在雍縣南、水出祠北、則出府之南。

④ 鄧城縣

『水經注疏』卷 5(『水經注圖』南 4 西 1 甲 1)

河水又東、逕鄧城縣北。……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376)、廣武將軍沅州刺史關内侯安定彭超立。

會貞按：沅州刺史彭超見《晉書・苻堅載記》。

彭超は建元十五年(379)に自殺。

施鰲存『水經注碑錄』「苻秦鄧艾廟碑」：「《集古錄》《金石錄》《廣川書跋》均有鄧艾碑題跋、《通志・金石略》有《方城侯鄧艾碑》、此四家著錄者、同一碑也、然而非酈道元所見者。……歐公嘗引其碑文、略云、「艾嘗爲沅州刺史、晉初發兵討羌、艾降巫者傳言、授以用兵之法、因以破羌。羌人神之、遂爲艾立廟、建碑紀其事」。……可知歐・趙・董三家所見之鄧艾碑、與酈氏所著錄之鄧艾碑雖同在一地、而一爲晉刻、一爲苻秦刻、酈氏見秦刻而未見晉刻也。……」

『三國志』鄧艾傳：「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このうち①の同昌縣のものは事實というより、彼にまつわる傳説に由來するようです。熊會貞氏が引いている文獻の中で、『讀史方輿紀要』が引く『城邑考』の中に、「鄧至城は鄧至山を以て名づく、是れ蓋し相傳うるに鄧艾嘗て此に至り、故に鄧至山の目有り、而して羌は因りて以て号と爲す」と記されています。鄧艾と羌族の繋がり深さを讀み取ることが可能です。②の長安縣のものは冤罪によって處刑された鄧艾の名譽回復にちなんでい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す。ここで注目したいのは①の方です。いま取り上げている「鄧太尉碑」を建てた人々の中心となっているのは羌族です。馬長壽さんは碑の後ろに列擧された人々の姓名を分析して、その3分の2が西羌の軍吏だと結論づけています。羌族にとって鄧艾が特別の存在であったことは①の資料だけでも十分に納得できますし、『三國志』鄧艾傳に、「鄧艾は西方在任中、長城を修理し、とりでを築いた。泰始年間、羌族が大舉反亂し、何度も刺史を殺害し、涼州への街道が斷絶した。官民が安全を保てたのは、すべて鄧艾が築いたとりでにたてこもったおかげであった」と記されていることも、そうしたことを裏書きするでしょう。西羌の軍吏が鄧艾の碑を修復したのは決して「たまたま」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ようです。そのことは④の鄧城縣の鄧艾廟からも窺えます。鄧城縣でも、ここ蒲城縣を同じく西晉時代に鄧艾碑が建てられ、やはり同じく前秦時代に、蒲城縣に遅れること 12 年で、新たに碑が建てられました。西晉の碑に関しては、歐陽脩が『集古錄』に一部を引いており、「艾嘗て沅州刺史と爲る、晉初に兵を發して羌を討つ、艾は巫者に傳言を降して、授くるに用兵の法を以てし、因りて以て羌を破る。羌人之を神とし、遂に艾の爲に廟を立て、碑を建てて其の事を紀す」という内容になっています。ここでも神秘的な形で鄧艾と羌族が結びつけられています。さらに建元十二年、西暦 376 年に新たに碑を建てた彭超という人物は、安定の彭氏です。彭という姓は、姚薇元氏の『北朝胡姓考』によれば、「羌中の大族」だそうです。

枹罕彭氏、西羌族也。『晉書』卷 125「西秦載記」云：……據此、可知彭氏爲羌中大族。『晉書』「前秦載記」有姚興帥彭沖穀、「後秦載記」有河州刺史彭奚念、均

羌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西羌諸姓」彭氏)

蒲城においても鄧城においても、晉初と苻秦の時代にそれぞれ鄧艾の碑が立てられて(修復されて)います。しかも蒲城の修復については明らかに西羌が主導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おり、鄧城についてもその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したがって、西羌にとって鄧艾は前秦時代においても特別な存在であったと結論づけていいのではないのでしょうか。

さて、その鄧艾に対する後世の評価ですが、『唐書』や『宋史』を見ると、武成王廟ですから太公望呂尚に従祀されていたようです。三國魏では張遼と鄧艾が祀られ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す。

『唐書』卷15「禮志」5:「建中三年(782)、禮儀使顔眞卿奏:「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越相國范蠡……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吳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丞相婁侯陸遜……、齊相管仲……魏太尉鄧艾・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吳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孱陵侯呂蒙……」。

『宋史』105「禮志」8:「宣和五年(1123)、禮部言:「武成王廟從祀、除本傳已有封爵者、其未經封爵之人、齊相管仲擬封涿水侯、大司馬田穰苴橫山侯、……」。於是釋奠日、以張良配享殿上、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並西向、田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並東向。東廡、白起・孫臏・廉頗・李牧・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鄧禹・馮異・吳漢・馬援・皇甫嵩・鄧艾・張飛・呂蒙・陸抗・杜預・陶侃……、西廡、吳起・田單・趙奢・王翦・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寇恂・賈復・耿弇・段熲・張遼・關羽・周瑜・陸遜・羊祜・王濬・謝玄・王猛……。凡七十二將云」。

ただ、『元史』では武成王廟の規模が縮小され、さらに『明史』では廟そのものが廢止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元史』卷76「祭祀志」5「武成王」:「以孫武子・張良・管仲・樂毅・諸葛亮以下十人從祀」。

『明史』卷50「禮志」4:「〔洪武〕二十一年、……是年詔以歷代名臣從祀、禮官李原名奏擬三十六人以進。帝以宋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從祀。……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廟、嘗遣官致祭如釋奠儀。至是、罷廟祭、去王號」。

『宋史』の列傳を見ると、卷264の「宋琪傳」、宋琪は北宋初めの人ですが、彼の傳に、「鄧艾此に於いて蜀を破り、今に至るまで廟貌存せり」とあります。

『宋史』卷264「宋琪傳」:「琪又上書言邊事曰、……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成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

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

一方、卷 406 の「洪咨夔傳」、洪咨夔は嘉定2年、西暦では 1209 年の進士ですが、彼の傳には、「鄧艾の祠を毀ち、更めて諸葛亮を祠り、其の民に告げて曰く、仇讐に事えて父母を忘るる母かれ、と」とあります。

『宋史』卷 406「洪咨夔傳」：「尋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

『宋史』の武成王廟の記事は宣和五年、西暦 1123 年のことですから、ごくおおざっぱに言えば、北宋と南宋との間で評価が百八十度転換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か。『資治通鑑』から『通鑑綱目』へとでも言いますか、魏正統から蜀正統へという考え方の変化に対応しているのかも知れません。しかし最後の王士禎の『古夫于亭雜錄』にも見える通り、清代になっても鄧艾を祀る廟は絶えなかったようです。

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卷2「鄧艾廟」：「四川劍州有小廟、祀鄧艾、余欲告州守廢之而未果、追賦一詩云：「申屠曾毀曹瞞廟、常侍〔高適達夫〕還焚董卓祠。劍閣至今思伯約、蜀巫翻賽棘陽兒」。……」。

■ おわりに

以上、甚だ簡略浅薄ながら、研究班で取り上げた碑文について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さて、最後に石刻拓本資料のデジタル化の経緯について、少し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この話が持ち上がったのは、センターがまだ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と稱していた 1998 年か 99 年ご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すでにセンター改組の検討が始められており、従来 of 事業はもちろん繼續するが、漢字や漢字文獻とコンピュータとの関係をもっと緊密かつ高度なものにするためのセンターに衣替えするという基本プランは固まっていたので、所藏資料のデジタル化は將來の活動にとって一つの基盤を与えてく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そういう提案をいたしました。當時のセンター内で必ずしも全面的な賛同を得られたわけではなかったのですが、幸い高田教授が強力に後押しして下さったので、とにかくスタート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私にできることと言えば、附箋にファイル番號を手書きして、それを拓本のネガに貼りつけ、寫眞屋さんに回すという單純な作業だけだったのですが、とにかく畫像デジタル化しておけば、將來きっと面白いことができるに違いないという確信めいたものはありました。そうした夢をいち早く叶えてくれたのが安岡助教授にほかなりません。ということで、安岡助教授にバトンタッチ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もご静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

安岡孝一*

1 はじめに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は、現在、約 10000 点の拓本資料を所蔵している。これらの拓本は、必ずしも美拓ではないものの、漢から清に至る主要な石刻をほぼ網羅しており、日本国内でも第一級の資料だと考えられる。これらの拓本のデジタル化を計画するにあたり、拓本のデータベースに対してどのような要件があるのかを調査したところ、おおまかに以下の 3 つが挙げられた。

- (a) 拓本の画像データベース
- (b) 釈文の全文データベース
- (c) 漢～清にまたがる文字データベース

(a) の要件は、古典籍の図書館である京都大学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では、ごく自然な要求である。図書館である以上、所蔵している拓本も閲覧に応じ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さりとて実物を見せると劣化が進む。そこで、デジタル化した画像で閲覧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b) の要件は、むしろ中国学の研究者からの要求であり、当代の資料に何が書かれているかを検索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c) の要件は、漢字オタクである筆者の願望である。漢字オタクは、書かれている内容よりも、むしろ漢字の字体そのものが見たいのである。

しかし、3 種類ものデータベースを構築する資金もパワーもない。そこで筆者は、これら (a)(b)(c) を別々のデータベースで実現するのではなく、1 つのデータベースでこれら 3 つの要件を満たすことにし、以下に述べる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を構築することにした。

2 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の概要

2.1 WWW インターフェース

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の WWW インターフェースは、検索画面、集字結果画面、拓本 DjVu 画面、の 3 種類の画面から構成される。検索画面 (図 1) は、収録されている拓本に対して釈文の全文検索をおこなうための入口であり、漢字一文字あるいは文字列を入力する。

検索の結果は、集字結果画面として表示される。集字結果画面では、検索にマッチした全拓本から、該当文字あるいは該当文字列を切り出して、拓本の年代順に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 (yasuoka@kanji.zinbun.kyoto-u.ac.j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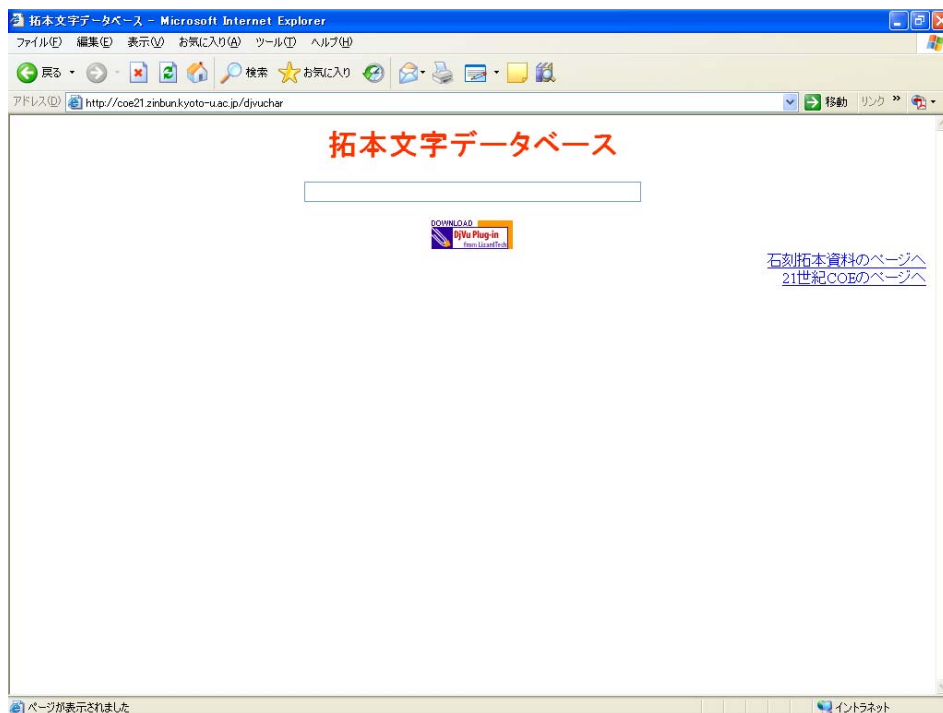


図 1: 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の検索画面

表示する。例として「京」を検索した場合の集字結果画面を図2に示す。各画像上にマウスを置くと、切り出し元となった拓本の標題がミニボックスに表示される。また、各画像をクリックすると、切り出し元の拓本 DjVu 画面へとジャンプする。

拓本 DjVu 画面では、拓本の透明テキスト付き画像を、テキストビハインド DjVu^[1]で表示¹する。この際に、集字結果画面で切り出された文字あるいは文字列は、反転してハイライト表示²している。例として、図2の6段目の左から9字目の「京」画像をクリックした場合の拓本 DjVu 画面を図3に示す。拓本 DjVu 画面は、上部のナビゲーションペインの機能により、ズームイン、ズームアウト、文字列検索などがおこなえる。また、拓本の各文字上にマウスを置くと、その文字に対する釈文がミニボックスに表示³される。各文字をクリックすると、その文字に対する集字結果画面へとジャンプする。

集字結果画面には、検索した文字あるいは文字列に対し、それを1文字長くした N-gram を、生起確率順に表示している。たとえば図2の集字結果画面では、「京」を含む 2-gram のうち、「於京」と「京兆」が上位にあることが一目でわか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ここで「京兆」をクリックすると、「京兆」による集字結果画面(図

¹表示には、<http://www.lizardtech.co.jp/download/djvu/>などで配布の DjVu プラグインが必要。

²ちなみにハイライト表示を消すには、URL から ?DJVUOPTS 以降を削除すればよい。

³Microsoft Windows 版の DjVu プラグインにはバグがあり、ミニボックス中の文字がしばしば文字化けする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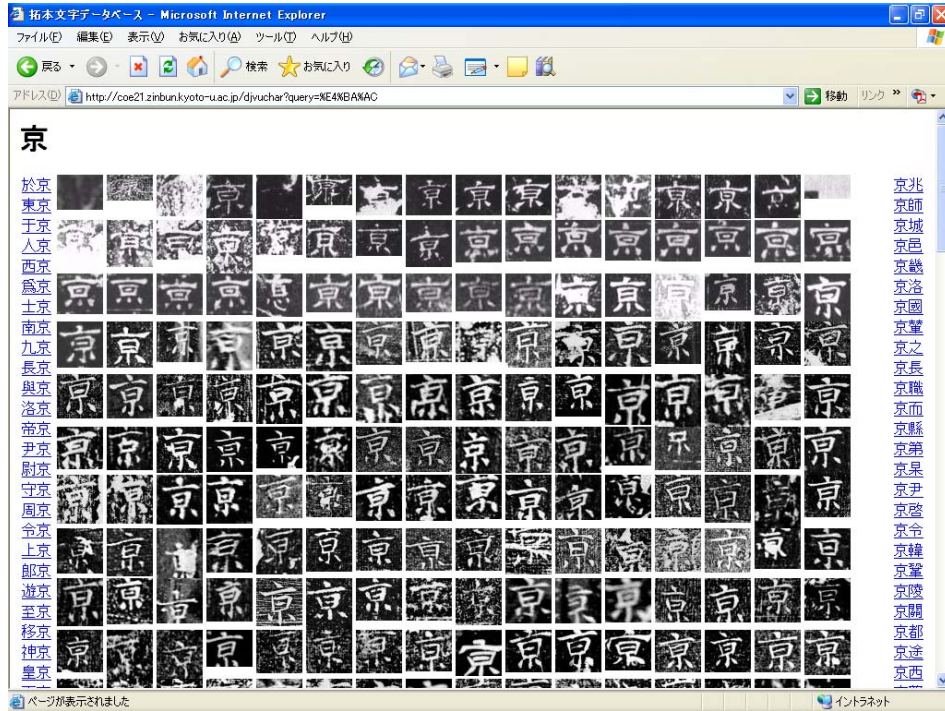


図 2: 「京」の集字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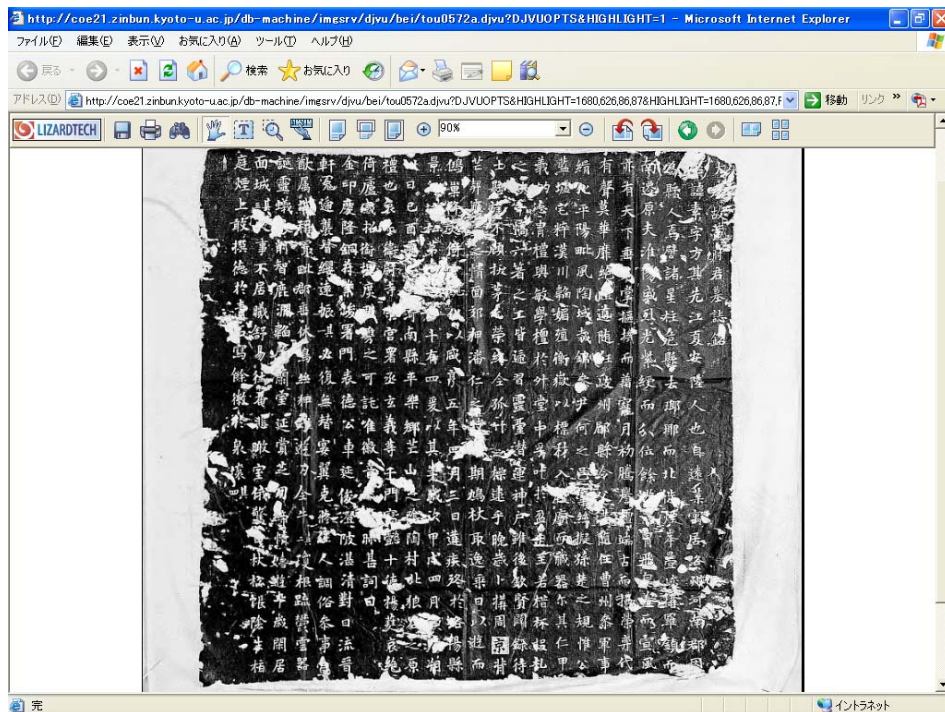


図 3: 「唐黄墓誌銘」の DjVu 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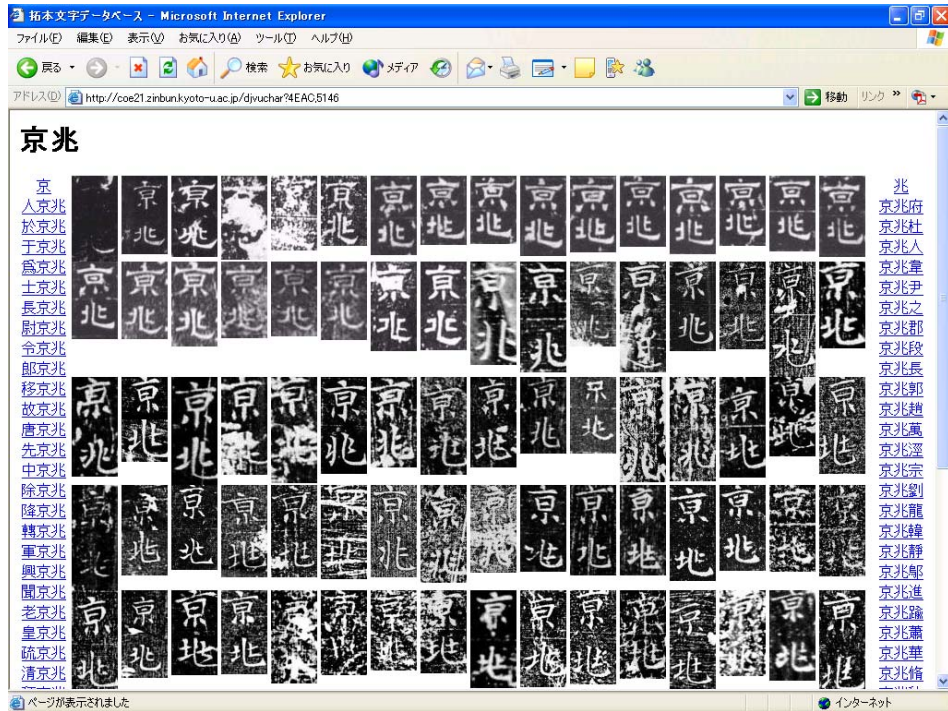


図 4: 「京兆」の集字結果



図 5: 「京兆脩」の集字結果

4) へとジャンプする。あるいは図4の画面でさらに「京兆脩」をクリックすると、今度は「京兆脩」による集字結果画面へとジャンプする。なお、孤立用例⁴においては、それを含む N-gram の生起確率を論じ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とから、当該拓本の釈文を示して検索者の判断をあおぐようにした (図5)。

2.2 座標付釈文情報の入力

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の中心にあるのは、各拓本画像に対する座標付釈文情報である。座標付釈文情報は、筆者が制作した透明テキスト付き画像作成ツール ttext-kanbun[2]⁵を用いて、作成している。ttext-kanbun は、漢文の画像ファイルとその釈文をもとに、透明テキスト付き画像の作成をサポートするツールであり、Microsoft Windows XP 上の Internet Explorer 6 で動作する。実際の作業手順としては、ttext-kanbun に読み込んだ拓本画像 (図6) に対して、1 字ずつマウスで囲んでいき、同時に釈文をテキストボックスに入力するだけである (図7)。

ttext-kanbun は、本来は透明テキスト画像作成ツールだが、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では、ttext-kanbun が出力する CSV 形式ファイルを、座標付釈文情報として用いている。ttext-kanbun の CSV 形式ファイルは、各行が文字ボックス 1 個に対応している。1 行は 5 つのフィールドからなり、順に、文字ボックス左上の X 座標⁶、文字ボックス左上の Y 座標⁶、文字ボックスの幅、文字ボックスの高さ、文字の UTF-16 による 10 進数表現となっている (図8)。

2.3 拓本 DjVu 画面と集字結果画面の生成

座標付釈文情報を含む CSV 形式ファイルは、筆者が作成したシェルスクリプト csv2djvuxml によって、DjVuXML 形式ファイル (図9) に変換される。変換の例を挙げると、「2743,369,82,80,22823」という CSV 形式の文字ボックスに対しては、DjVu のテキストビハインド内の透明文字を表す CHAR タグ

```
<CHAR coords="2743,369,2825,449" sep="no">&#22823;</CHAR>
```

と、ミニボックスおよびハイパーリンクを表す AREA タグ

```
<AREA coords="2743,369,2825,449" alt="&#22823;" href="/djvuchar?5927" />
```

とに変換をおこなう。釈文中の句読点に対しては CHAR タグや AREA タグの生成はおこなわないが、句読点ごとに「</WORD><WORD>」という WORD タグ上の区切りを入れることで、句読点をまたいだ検索を抑制している。この DjVuXML 形式ファ

⁴複数の同じ用例が単一の拓本のみに現れる場合を含む。

⁵<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yasuoka/ftp/program/ttext-kanbun.lzh> からダウンロード可能。

⁶座標原点は拓本画像の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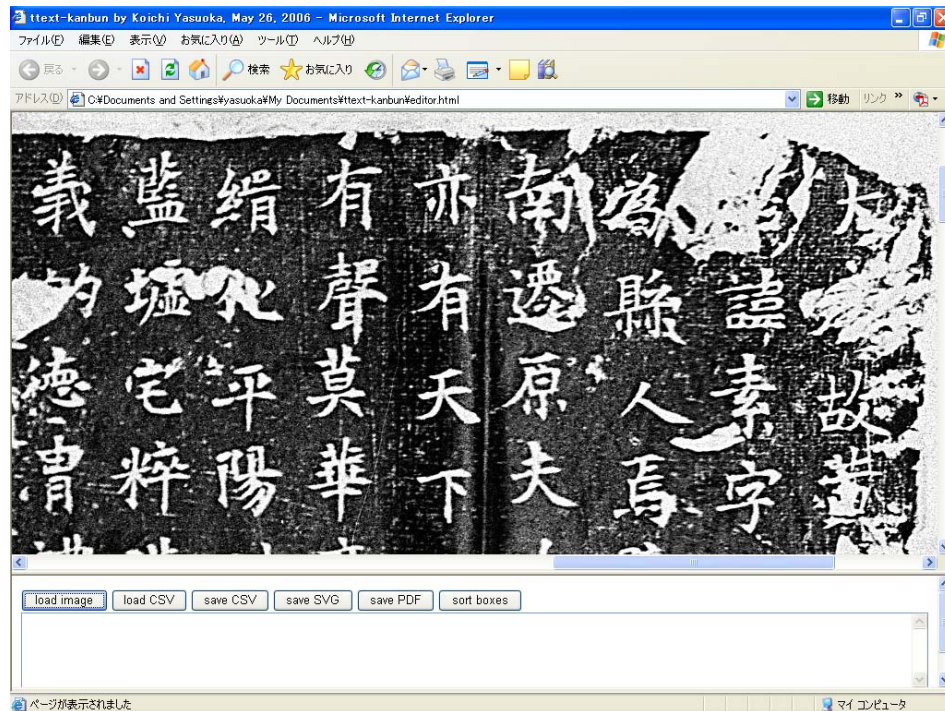


図 6: ttext-kanbun での画像読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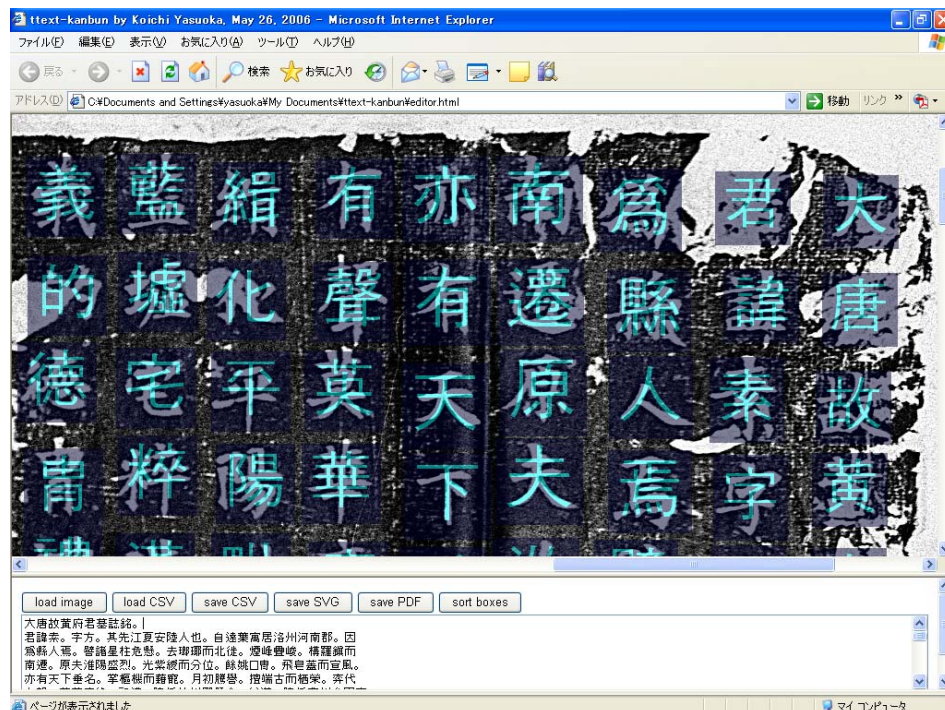


図 7: ttext-kanbun での座標付釈文情報の入力

```

2743,369,82,80,22823
2742,475,82,80,21776
2735,581,82,80,25925
2731,670,82,80,40644
2730,773,82,80,24220
2725,869,82,80,21531
2725,969,82,80,22675
2722,1076,82,80,35468
2728,1191,82,80,37528
NaN,NaN,NaN,NaN,12290
NaN,NaN,NaN,NaN,13
NaN,NaN,NaN,NaN,10
2626,365,82,80,21531
2635,471,82,80,35569
2620,566,81,93,32032
NaN,NaN,NaN,NaN,12290
2624,672,81,93,23383
2622,770,81,93,26041
NaN,NaN,NaN,NaN,12290
:

```

図 8: 「唐黄墓誌銘」の CSV 形式ファイル

イルを、`djvuparsexml`⁷を用いて、拓本 DjVu 画面の DjVu ファイル中に埋め込んでいる。さらに、DjVuXML 形式ファイルの CHAR タグと WORD タグを、そのまま OpenText でインデクス化することで、文字列検索エンジンを実現している。

集字結果画面の各画像は、DjVu ファイルから `ddjvu`⁸と `pnmcut` で文字画像を抽出し、`pnm scale`と `cjpeg` で幅 50 ピクセルの JPEG 画像としている。集字結果が複数の文字に渡る場合、それらが拓本で同一行にあるときには単一の JPEG 画像としているが、複数行に渡るときには複数の JPEG 画像を CSS の縦書きモード⁹で上下に配置している。また、集字結果画面中の釈文は、CSV 形式ファイルから生成している。

拓本 DjVu 画面におけるハイライト表示は、DjVu プラグインの機能を用いて実現している。実際には URL 中の HIGHLIGHT パラメータ¹⁰がそれである (図 3)。

3 異体字処理の実際

漢字テキストを含むデータベースの運用において、最も問題となるのが異体字処理である。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は、漢字そのものを扱うデータベースでもあ

⁷LizardTech 社の SPARC Solaris 版『Document Express with DjVu』中のコマンド。フリーの『djvulibre 3.5.17』中のコマンド `djvuxmlparser` は、残念ながら CHAR タグに対応していない。

⁸『djvulibre 3.5.17』中のコマンド。

⁹HTML 上は `STYLE="writing-mode:tb-rl;width:50px"`の SPAN タグ。縦書きをサポートしていないブラウザでは、残念ながら上下に配置されない。

¹⁰HIGHLIGHT パラメータには座標が含まれるが、DjVu プラグインでは座標原点が画像の左下。


```

<?xml version="1.0" ?>
<!DOCTYPE DjVuXML PUBLIC "-//W3C//DTD DjVuXML 1.1//EN"
    "pubtext/DjVuXML-s.dtd">
<DjVuXML>
<HEAD>file:tou0572a.djvu</HEAD>
<BODY>
<OBJECT data="file:tou0572a.djvu" type="image/x.djvu"
    height="3368" width="3175" usemap="tou0572a.djvu" >
<PARAM name="DPI" value="400" />
<PARAM name="GAMMA" value="2.200000" />
<HIDDENTEXT><WORD>
<CHAR coords="2743,369,2825,449" sep="no">&#22823;</CHAR>
<CHAR coords="2742,475,2824,555" sep="no">&#21776;</CHAR>
<CHAR coords="2735,581,2817,661" sep="no">&#25925;</CHAR>
<CHAR coords="2731,670,2813,750" sep="no">&#40644;</CHAR>
<CHAR coords="2730,773,2812,853" sep="no">&#24220;</CHAR>
<CHAR coords="2725,869,2807,949" sep="no">&#21531;</CHAR>
<CHAR coords="2725,969,2807,1049" sep="no">&#22675;</CHAR>
<CHAR coords="2722,1076,2804,1156" sep="no">&#35468;</CHAR>
<CHAR coords="2728,1191,2810,1271" sep="no">&#37528;</CHAR>
</WORD><WORD>
<CHAR coords="2626,365,2708,445" sep="no">&#21531;</CHAR>
<CHAR coords="2635,471,2717,551" sep="no">&#35569;</CHAR>
<CHAR coords="2620,566,2701,659" sep="no">&#32032;</CHAR>
</WORD><WORD>
<CHAR coords="2624,672,2705,765" sep="no">&#23383;</CHAR>
<CHAR coords="2622,770,2703,863" sep="no">&#26041;</CHAR>
</WORD><WORD>
:
</WORD></HIDDENTEXT>
</OBJECT>
<MAP name="tou0572a.djvu">
<AREA coords="2743,369,2825,449" alt="&#22823;" href="/djvuchar?5927" />
<AREA coords="2742,475,2824,555" alt="&#21776;" href="/djvuchar?5510" />
<AREA coords="2735,581,2817,661" alt="&#25925;" href="/djvuchar?6545" />
<AREA coords="2731,670,2813,750" alt="&#40644;" href="/djvuchar?9EC4" />
<AREA coords="2730,773,2812,853" alt="&#24220;" href="/djvuchar?5E9C" />
<AREA coords="2725,869,2807,949" alt="&#21531;" href="/djvuchar?541B" />
<AREA coords="2725,969,2807,1049" alt="&#22675;" href="/djvuchar?5893" />
<AREA coords="2722,1076,2804,1156" alt="&#35468;" href="/djvuchar?8A8C" />
<AREA coords="2728,1191,2810,1271" alt="&#37528;" href="/djvuchar?9298" />
<AREA coords="2626,365,2708,445" alt="&#21531;" href="/djvuchar?541B" />
<AREA coords="2635,471,2717,551" alt="&#35569;" href="/djvuchar?8AF1" />
<AREA coords="2620,566,2701,659" alt="&#32032;" href="/djvuchar?7D20" />
<AREA coords="2624,672,2705,765" alt="&#23383;" href="/djvuchar?5B57" />
<AREA coords="2622,770,2703,863" alt="&#26041;" href="/djvuchar?65B9" />
:
</MAP>
</BODY>
</DjVuXML>

```

図 9: 「唐黄墓誌銘」の DjVuXML 形式ファイル

ることから、異体字の問題は非常にシビアであり、データベース構築にあたって、2つのレベルでの異体字処理を導入せざるをえなかった。データ入力時の異体字処理と、検索時の異体字処理である。

3.1 データ入力時の異体字処理

データ入力を複数の人員でおこなう場合、入力する漢字にどうしても揺れが生じる。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では基本的に Unicode を用いているが、Unicode に含まれる多くの異体字のうち、どれを釈文の入力に用いるべきかというのは、漢字に対する素養があまり高くない入力作業者にとっては、かなり判断が難しい。また、Unicode には「𪛗」(U+665A)と「𪛗」(U+6669)のように、一見して見分けのつかない漢字が異なる符号位置に収録されており、入力作業者にさらなる混乱を誘う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そこで、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の入力処理においては、複数の異体字を「代表字」¹¹に寄せる処理をおこなった。現実の処理としては、CSV 形式ファイルから DjVuXML 形式ファイルに変換する際に、異体字をまとめるようにしている。すなわち、入力作業者が「𪛗」(10進数表現の UTF-16 で 26202)を入力しようが「𪛗」(10進数表現の UTF-16 で 26217)を入力しようが、DjVuXML 形式では「晩」に変換するような仕掛けを、csv2djvuxml 中に施した。これにより入力作業者は、Unicode の異体字に、あまり振り回されずにすむこととなった。

3.2 検索時の異体字処理

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の検索時には、検索者が入力した文字に対して、異体字検索をおこなう仕掛けを、WWW インターフェース中に施した。基本的には、入力処理における「代表字」と同様のやり方だが、それに加え、日本の常用漢字や中国の簡化字や韓国のハングルに対し、複数の漢字の検索を同時におこなうことを可能とした。たとえば、検索画面で「弁」を検索すると、「辯」「辨」「瓣」「弁」を同時に集字する。あるいは、「𪛗」を検索すると、「𪛗」「𪛗」「𪛗」「𪛗」「𪛗」「𪛗」「𪛗」「𪛗」などを同時に集字する。この機能により、日本・中国・台湾・韓国の平均的な漢字学習者であれば、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を簡便に検索することが可能だと考えられる。

¹¹ 康熙字典体を基本としたが、細かい字体差にはこだわらず、JIS X 0208 に含まれる漢字を優先した。

4 おわりに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が有する拓本資料に対して、画像データベースと釈文データベースと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を同時に実現すべく、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を構築した。この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は、日本語環境のみならず、中国語環境（簡化字でも繁体字でも）や韓国語環境からも容易に検索可能である。

この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の WWW インターフェースおよび検索機構は、京都大学 21 世紀 COE「東アジア世界の人文情報学研究教育拠点」の成果物 [3] であり、<http://coe21.zinbun.kyoto-u.ac.jp/djvuchar> で公開中である。さらに、平成 18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効果促進費）「漢字字体変遷研究のための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によって、拓本画像と座標付釈文情報を随時作成中であり、現時点では漢～唐の拓本を約 1400 点収録している。今後も構築を続け、漢字字体変遷の研究に資したい。

参考文献

- [1] 安岡孝一：透明テキスト付き画像へのいざない，東洋学へのコンピュータ利用，第 14 回研究セミナー（2003 年 3 月），pp.31-42.
- [2] 安岡孝一：透明テキスト付き画像作成ツールの開発，東洋学へのコンピュータ利用，第 15 回研究セミナー（2004 年 3 月），pp.9-16.
- [3] 安岡孝一：「縁」モデルにもとづく拓本文字データベース，東洋学へのコンピュータ利用，第 16 回研究セミナー（2005 年 3 月），pp.3-12.